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②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③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④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⑤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⑥ 中国市场名城
- ⑦ 中国地热城
- ⑧ 中国书法名城
- ⑨ 国家园林城市
- ⑩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⑪ 国家卫生城市
- ⑫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⑬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 ⑭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⑮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厂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
两次谈话 罗荣桓 04

【峥嵘岁月】

- 鏖战齐鲁（二） 吴瑞林 10
刘佐眼中的“马鹿事件” 张玉洪 15
沭河两岸战火中的普通孝事 王宗富 19

【名人素描】

- 曾国华传（一） 晓冰岭上梅 22
唐代忠烈典范颜杲卿 魏宝玉 27

【文化掇英】

- 齐鲁风俗民情 中国年鉴 31

【史海撷萃】

- 忆师哲视察厉家寨 王 滨 38
王凤鸣始末 红 星 42

【探索发现】

- 背红十字挎包的英雄许忠诚 高 雷 47

【蒙山沂水】

- 导沭整沂工程 山东记忆 50
大美新临沂之——涑河 本 编 54

【影像沂蒙】

- 抗战初期的鲁南百姓（下） 大荒堂主 55

【诗画赏析】

临沂老童谣	一名	57
羊欣及其书法	羊氏文史考古	60

【百家渊流】

新四军军部旧址与河湾丁氏	丁兆铭	63
山东世家大族的南迁（下）	国家史册	68

【文明之星】

新时代乡镇党委书记楷模许步忠		
	衣方杰 王富军	73

【沂蒙名医】

一位青年中医传承人的国医情怀		
——话说朱法永	胡爱军	76

【史志动态】

80

封面：涑河

（详见本期《大美新临沂之——涑河》）

封底：恭敬，礼也；谦和，乐也；谨慎，利也；斗怒，害也。

选自《荀子·臣道》 胡石/书



地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编：276000

电话：0539-8727562

邮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临沂市史志系统内部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

罗荣桓



毛泽东主席与罗荣桓元帅

一、关于编写山东抗日战史的方针方法

写军队历史不能不涉及党史，军队历史就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写战争史。

抗日战争中山东哪些人犯错误，根本不必提名，但原则问题要谈清楚，如以我为主，还是“建设共同根据地”？这就是原则问题。但我们根本不必说是不是路线问题，只写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了，至于犯错误的具体细节、谁说的、谁做的等等都不必写。

山东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包括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些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可以不写，也不要牵涉到哪些人负责，有些经验教训可以从正面去写。写的时候，应按山东抗战的过程划分几个历史时期，用一条红线串起来，并阐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思想。

无论写抗日战争史或是解放战争史，都以根据地作主题为好，不以部队为主来写。因那只能解决战术问题，而不能解决战略思想问题。脱离整个政治形势去写是写不好的。如平型关战役，主要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如果单写伏击战就失掉了它的政治意义。梁山战斗抓俘虏多就是第一，还缴了几门炮，写时必须说明当时大家对平原作战无信心，战后说平原一样可以作战，可以消灭敌人。假使不这样写就一定看不出问题来。有些战斗不能单纯看成是一个战斗，而是有着一定的政治意义。总之，要说明思想观点，解决了什么问题。

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贡献是很大的，出兵总数在百万以上，现在山东籍的干部遍布全国，有好几个军是从山东发展起来的。山东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定地跟着党走。到抗日战争末期，山东是比较大的一块根据地，有一千几百万人口。所以对山东人民的功绩应有足够的评价。没有山东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华中的收缩阵地，就没有立足之点；没有山东根据地，要集中那样多的兵力进军东北，以及对大江南北的作战支援也是很困难的。

二、山东抗日战争的几个发展阶段

山东抗日战争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韩复榘退出山东，我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这是第一阶段，即开始发展的阶段

“七七事变”以后，平、津相继失陷，日军分兵沿津浦路南犯。日军侵入山东后，山东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和国民党官吏纷纷逃跑，丢下了很多枪支，出现了很大空白。当时我党即提出，把坚持山东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并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要求各地的党组织迅速发动组织群众，抓紧时机举行起义。在我党的领导下，山东各地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有声有色。开始，起义队伍中仅有少数党员作骨干，主要靠平津流亡学生、从济南退出的学生、从监狱放出的我党党员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的流散军人，搜集一些民间枪支和争取改造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里的地方武装。那时，党的基础很差，没有斗争经验。我们不能责备他们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秀才造反是造对了，发动了武装起义。这个时期徂徕山、长白山、天福山、牛头镇、十字路、泰西、湖西、鲁西北、冀鲁边、苏鲁边等地发动的武装起义，都要在战史中写上一笔，只有这样，才能看出这个阶段党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的全貌。

（二）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为山东地区抗日战争的第二个阶段

为了加强对山东抗日工作的领导，把山东的武装斗争统一起来，党中央从延安调来了大批党员、干部（其中还有一些是红军干部），并指示，将山东的基本武装组建成几个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的番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

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山东已完全沦为敌人后方，敌人的矛头主要向南，控制中心城市、重要港口以及铁路交通线，对我山东腹地广大平原还没有开始大的“扫荡”。这种形势为我党领导山东人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时国民党在山东也乘机发展武装，企图恢复其统治。一九三八年年初，韩复榘被处决，蒋介石委任沈鸿烈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并派军阀石友三部由豫北入鲁。原在山东内地的和逃跑后又窜回的一些国民党分子、旧官吏及地主豪绅等，也纷纷扩充势力，自立旗号，到处委派专员、县长，限制与破坏人民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

主席多次指示山东我党，要以我为主，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是中央这些指示没有很好地贯彻，我们对于独立担当山东抗战事业，建立以我为主的根据地的思想是不很明确的，也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放手发动群众，搞农民运动，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根本保证。只有减租减息搞好了，农民才能够充分发动起来。农民运动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但鲁南就曾有过“搞农会不能搞武装斗争”“农民掌握枪杆子没有用”等错误说法。搞农民运动不要武装斗争是奇怪的，实际上必须把发动武装斗争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不搞群众武装斗争，军队也是巩固不了的。

“以我为主”就是要以充分发动群众作基础。没有群众作依靠，“以我为主”就成了一句空话。沈鸿烈、石友三他们有统治经验，他们一进山东就立即抓地盘、抢政权，很快获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而我们当时没有明确坚定的战略眼光，对根据地的重大意义重视不够，所以对某些战略要点，特别是某些重要山区，没有及时予以控制，或因局部困难而轻易退让。人家控制了一些重要山区，把我们逼到外围平原地区和铁路沿线，使我无所依托。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在敌后要以我为主，我们吃够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搞“共同根据地”的亏，弄得自己几乎无立足之地。本来，当时环境较平静，没有大的“扫荡”，一九三八年萧华纵队也已进入冀鲁边，第六八五团进到了湖西，鲁西、鲁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形势是很好的。那时如果能充分发动群众，早抓政权，早抓根据地建设，发展群众武装，山东的形势是会更好一些的。但直到成立了分局、山纵，还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沂蒙山区主要部分都给人家了。

（三）第一一五师入鲁直到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为第三阶段

除了萧华纵队和第六八五团以外，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进入鲁西，九、十月间进入鲁南。那时日军回师山东，占据了大部分县城，并开始“扫荡”平原。国民党在山东也调整部署，加强实力，积极反共。于是，在山东战场上，形成了敌、顽、我日趋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形势。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于学忠部两万余人先后进入山东，抢占了沂蒙、莒日、临费等重要山区；国民党沈鸿烈部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抢占了沂鲁山区的要点东里店，并积极与我制造磨擦。

这个阶段，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规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已得的阵地，发展人民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山东我党我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对敌对顽斗争中取得了一定胜利，山东各地区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我军对敌对顽都没有争取到优势，常常处于敌顽夹击之中。

第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后，敌人集中力量搞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在陆房、汶上、梁山战斗后，第一一五师转入了鲁南，便经常处于两面夹击，倍受威胁的境地，处境比较困难。我们进入郯（城）马（头）地区后，曾要求山东分局南下，分局要求第一一五师北上，向分局和山东纵队靠拢。第一一五师留下部队坚持鲁南斗争，师部向北移至临沂以北青驼寺附近。但因山区太困难，后来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师部就南下滨海区找了个吃饭的地方。严格说来，北上收缩退却，如果我们全部北上了，东北军将完全占领鲁南山区，我们将被压缩到沂蒙山区，实际上那是为东北军让路。失掉了鲁南，将来南下就没有出口，对陇海路南和湖西地区的联系也都不利。我们坚持鲁南，开辟滨海地区，打开甲子山区，都是为了配合坚持和发展沂蒙山区。如果不这样，沂蒙山区就会处于内外夹击的形势。像一九四一年冬，日军对沂蒙地区进行“铁壁合围”“扫荡”时，如果没有鲁南、滨海两个外围地区的坚持，沂蒙根本坚

持不住。事后看，坚持鲁南的意义更为明显。这些事根本不是靠拢不靠拢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统一部署和领导的问题。

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有指示，要山纵归第一一五师指挥。同时在敌大“扫荡”时，分局开会，讲了反“扫荡”部署，要他们赶快从北沂蒙的反顽阵地上撤下来，否则敌人一出动，我们将两面受夹击，但未引起重视，结果受了很大损失，这些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第一一五师主力入鲁之初，由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但不久，一纵就不存在了。由于斗争方针和军事指挥迟迟统一不起来，尽管中央作过多次指示，但是仍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统一军事指挥长期不能实现，对于山东的斗争发生了严重的影响。直到一九四一年以至一九四二年几次大“扫荡”中遭受到重大损失，失败的教训使大家清醒过来，感到不统一不行了。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这时候中央也作出了各个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

另一个重要争论是搞分散游击战，还是搞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的问题。山东是处在敌人后方，只能以游击战为主，搞大兵团的运动战，是送给敌人消灭。尤其是当时山东的主要山区已被国民党掌握了，我处于敌顽夹击、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搞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尽可能地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进行巧妙的斗争。要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后来我们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就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边战术”^[1]，组织敌后武工队，开展政治攻势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执行游击战争的方针。一九四〇年九月在鲁南召开的桃峪会议，实际上就是争论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当时就有一种意见说，在山东“敌后已进入相持阶段”“我对顽斗争已取得了优势”“我们要大搞交通破袭战”等等。我们是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不同意搞运动战。敌后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过分刺激敌人有什么好处？我们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山东的形势和游击战的方针，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没有搞大规模的破袭战。那时曾有人批评说“第一一五师是主力部队，为什么不打大仗？”实际上一一五师老部队只有一个团。就是部队再多些，也不能搞运动战。

这个阶段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四年工作总结”的问题。一九四二年四月，山东分局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作出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山东抗战四年来的成绩及经验教训，指出了山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明确了以我为主、发动群众、开展分散游击战争等对敌顽斗争方针，指出了以后的各项任务及斗争方向。特别是确定了要纠正山东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个总结使山东我党我军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对山东工作的转变，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总结之后，各区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明确地贯彻了以我为主的方针，分散游击战争也有了广泛的发展。

（四）山东抗日战争的第四个阶段是山东军区成立，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的时间，可以说从山纵与一一五师合并成立山东军区就开始了，因为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这一时期的任务主要是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此外，就是夺取甲子山区。一九四三年，敌人继续扩大面的占领，加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其“蚕食”在上半年达到了顶点。我各根据地的斗争十分紧张。在鲁南，敌人搞得我们只剩上下“一条线”；滨南也被搞掉了；冀鲁边站不住脚了，需要以清河区作依托；清河区这一年遭受敌人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三次。根据这些情况，为了改变被分割的不利地位，我们广泛地开展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进一步加强了全面对敌斗争。同时，我们紧紧掌握了有利的

历史时机，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反击其反共阴谋，团结中间力量，结果粉碎了李仙洲入鲁反共的企图，送走了东北军出鲁。山东已无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山东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了，到一九四四年就有了显著的变化。胜利了，发展了，粉碎了敌之“扫荡”“蚕食”，又集中部队反击顽固派，滨海收复了甲子山区，滨海南部、鲁南也扩大了，以后打开了诸城地区和胶东直接打通了联系。山东形势基本好转，但是形势的根本好转，还是在完成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三个月作战计划以后。

三个月作战计划主要是开辟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以打通和扩大渤海和胶东，以及他们同铁路以南地区的联系；再就是夺取临沂、费县，使胶济铁路以南的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地区联成一片，以便在大反攻时腾出手来向大城市进军。但是，正当我军准备发起攻势之时，敌人突然增兵山东，进行了一次全区性的大“扫荡”。当时有些人对于敌人这次“扫荡”、增兵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一九四一年的形势又来了，主张分散作战，化整为零，要否定三个月作战计划。实际上，敌人那次“扫荡”，只不过是为重点防御而采取的以攻为守的行动，是借“扫荡”掩护调整部署。当时苏军已打到了柏林，欧战即将结束，我国的抗日战争已处于大反攻的前夜，形势是很好的。我们根据这一正确估计，坚决贯彻执行了三个月作战计划。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较好的是胶东、渤海和鲁中；执行得不好是滨海，他们对临沂、费县重视不够，没有把主力摆在临沂，而只派了一个分区政治部主任在那里，结果日军投降时，日本人退出了临沂，叛军王洪九却乘机插进去，给以后的作战带来很多麻烦。大反攻时，我们集中了七个团搞临沂，牵制了很大兵力。假如我们早占了临沂，在大反攻时，就可以抽出兵力包围济南，或向北机动，这样对以后进军东北的军事行动就会更加有利。我们经过了五、六、七三个月作战，基本上完成了预定计划，打通了几个战略区的联系，创造了最后反攻日军的有利阵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主动了，抽出了很大兵力参加大反攻。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我们就编成了五十个团，这是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的结果。否则，大反攻来了，我们的兵力还没有集中起来，内地的敌占据点还没有肃清，那就被动了。在三个月作战的基础上，我军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作战，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山东的兵力发展到二十七万人。

山东党、政、军实现一元化领导后，方针政策是更加明确了：“以我为主，不要国民党插手”“要独吞山东”，体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三、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四年工作总结”和“五年工作总结”

一九四二年四月山东分局所作的四年工作总结，应当肯定是基本正确的。它贯彻了少奇同志指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以及发动群众等问题。明确了对敌对顽斗争方针，达到了统一。以后搞的五年工作总结基本精神不对，不是贯彻四年工作总结，而是想用它代替四年工作总结。四年工作总结还没有很好地传达，传达了也没有讨论，没有很好地转变工作，而五年工作总结却说群众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五年工作总结对三角斗争仍然认识不足，不承认两面作战，不是贯彻四年工作总结的精神。五年工作总结对山东工作没有什么好的作用。

（二）第一一五师入鲁的时机、作用及发展方向等问题

关于第一一五师入鲁的时间，萧华纵队一九三八年秋就进入冀鲁边地区；第六八五团是一九三八年底就进入湖西地区。关于第一一五师过津浦路东的情况是这样

的。第一一五师到鲁南，有的同志本来是不同意的。后来鲁西形势紧张。我们先把后方摆到鲁南，有的同志没通过第一一五师就把它（王秉璋、黄励部）编为“东进支队”了。

第一一五师到鲁南以后，有的同志要师部北上与山纵靠拢。根本问题不是靠拢不靠拢的问题，而是统一领导的问题，当时是各人搞各人的。沂蒙山区的北线是东北军，第一一五师坚持鲁南，以后打开甲子山区，都是为沂蒙作外围，使这些地区和沂蒙山区联系起来。

第一一五师入鲁时，中央曾有准备向南机动（进入华中和河南地区）的战略设想。以后情况变化了就没有去。第一一五师的部队大部分还是南下，如第三四四旅、六八五团及以后的教五旅等。第一一五师是有明确的建设山东根据地的观念的。

（三）湖西及山东的“肃托”问题

对湖西“肃托”事件分局没有讨论是有责任的。以后许多地区又重复了这个错误，如沂蒙、渤海、胶东等地，又杀了许多人。湖西“肃托”的错误，主要原因是党内不纯，思想混乱，没有统一的斗争方针和明确的政策。领导干部都是些学生，没有斗争经验，加上有反革命分子混在党内，被人钻了空子。

（四）整风问题

一九四四年整风审干时，有人说“无风可整”。当时干部的许多思想问题还没有搞清。“风”还是要整的，但应以整顿思想改进作风为主，不以审干为主。我们已经有过湖西“肃托”的教训，山纵和各地区（鲁中、清河、胶东）的肃反也搞得很严重，血迹未干，不能再那么搞了。有的地方在群众中搞“自首运动”，搞出许多假特务。我们的整风没有搞得像延安的“抢救”那样，主要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有的同志把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重点放在暴露思想、审查干部方面。他一定要搞，就先搞了个司令部、政治部，效果不好，以后就收了。否则不得了。我们提出“以检查领导开始，以检查领导终结”。分局机关整风中有的人攻击黎玉，想从此打开一个缺口，攻击分局领导，那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情况下保护黎玉同志，对攻击他的人进行批评是对的。总之，当时山东的整风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般说，偏差不大。

（五）抗战期间山东党内的运动战思想问题

山东党内运动战思想不能以陈光为代表，陈在行动上有时虽想打大仗，但还不是反对游击战方针的。桃峪会议后向中央报告，说要以运动战为主，也是错误的主张。我们对此是反对的，我们一贯执行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如搞“翻边战术”等。

注释：

本文是罗荣桓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的负责人于1959年6月2日和1960年12月12日两次谈话。

[1] “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人那里去。

鏖战齐鲁 (二)

吴瑞林

三、要靠自己的队伍

鲁西南的曹县，这时是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司令部和以沈鸿烈为主席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所在地。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蒋介石决心在津浦线上以徐州为中心同日军决战。于是，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几十万军队云集苏鲁豫皖边，跨淮河两侧，扼津浦、陇海铁路两线，进行防御战的部署，曹县一时成了李宗仁的指挥中心。

经张霖之同志具体安排，我们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两天之后，应邀参加了国民党各方为台儿庄战役胜利而召开的祝捷大会。会上，先由李宗仁、沈鸿烈讲话，国民党山东第六区即聊城地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也到会讲了话，接着由郭洪涛同志代表山东八路军讲话。郭洪涛同志在表示祝贺胜利、赞扬友军英勇作战的同时，着重说明我党我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慷慨陈词，引起很大震动。加上我们百余干部整整齐齐地列队参加，也给人以威严之感。范筑先是位抗日民主人士，拥护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中共山东省委和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对我们热诚友好。李宗仁这时也持合作态度。沈鸿烈是个反共专家，态度就不同了，认为我们派部队来抢他的山东了，表现出老大不快，会后即暗暗布置武装来抓我们。他的这一反共行动被我们及时察觉，张霖之同志立即安排车辆，连夜悄悄地将我们送至黄河边，我们转乘小船北渡黄河至寿张县，终于脱离了险境。郭洪涛同志向张霖之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刘少奇对鲁西北工作的指示后，我们旋经黄河故道穿过东平湖登岸，到达运河以西的东平县，于1938年5月初进入了我们自己的队伍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后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六支队）的活动区域。这次风波，给我们上了一课，使我深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使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要



郭洪涛带领49人到达泰安徂徕山

团结国民党友军抗日，但要真正坚持抗日到胜利，还要靠我们自己的队伍，要靠我们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广大人民，建立并发展壮大我们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否则，我们既无力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又难以团结国民党友军抗日，而且稍有不慎还有亡头的危险，我们怎么去向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交代呢？吃一堑，长一智。郭洪涛同志要我们都改名换姓，以防万一。他改名为郭洪甫，王海山同志改为王子文，其他老同志也都改了名。我在红四方面军的姓名是吴尚德，这次郭洪涛同志给我换了个名字，叫杨昆。

我们在东平利用一天休整时间，彻底地搞了一下个人卫生。没有浴室怎么办？长征过草地时，我曾用竹杆和木棍搭个架子，四周用床单一罩就是一座“浴室”。这次又照此办法，大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满身的尘垢和疲劳都一扫而空。第二天在一个树林里听完了张霖之同志作的关于山东抗日形势的报告以后，我们就转移至抗敌自卫团的驻地肥城。郭洪涛同志向抗敌自卫团的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除何光宇等四五位同志留在鲁西地区工作以外，我们在抗敌自卫团所派武装的护送下离开肥城后，便独立通过比较安全的敌后地区向泰山区挺进，每天要行军二三十公里。周赤萍同志和我的身上还留有过去的战伤，尚未痊愈，长途跋涉显得特别吃力。钱钧和其他同志很爱护我们，帮我们背背包，并提醒郭洪涛同志：“他们俩是伤号，替他们搞辆小推车坐坐吧！”郭洪涛同志得知后也想方设法照顾我们。这些深情厚谊，至今仍能激起我最美好的回忆。约两三天后，行至泰安西部接近津浦铁路，要准备过封锁线和铁路线了。从延安出发时，党中央发了几枝短枪，要我们沿途自卫。郭洪涛同志原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开始对我们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干部不很了解，就将短枪交给了原工作在陕北的同志，当他了解我们都是红四方面军中经过战斗考验的指挥员后，过铁路时便将枪转交给钱钧、周赤萍、杨国夫、吴坤同志和我，要我们担任掩护同志们过铁路线的任务，保证同志们安全，有情况就鸣枪报警。我们几人在铁路线上严阵以待，等同志们都安全越过铁路后前进几里路了，我们才解除警戒跟上去。经过一段行程，进入泰安东南部徂徕山东南麓的一个村镇确峪，由于此地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活动区，很安全，我们就住下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委林浩同志已确定，由该支队三团团长汪

洋、政委张岗、教导员王一平等同志率部过铁路西出接我们，但因他们分散活动于鲁中各地，西出的路程长于我们由肥城东进的路程，我们行动又较迅速，故当我们一到达确峪，他们就迎接上了。稍事休息，我们整队听了林浩同志具体分析山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报告，接着参加第四支队为我们举行的联欢会，“欢迎中央派来的老红军干部”的口号声响彻山谷。第四支队当时还为已故司令员洪涛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我们也参加了。

5月21日，郭洪涛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驻地泰安东南部的南上庄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山东工作的指示。这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已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省委由林浩同志临时主持。郭洪涛同志到来后，即接任省委书记。不几天，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扩建为苏鲁豫皖边省委。我们的工作都由省委统一分配。听了林浩同志的报告，得知鲁西北我党影响下的范筑先的部队和我党独立建立的第六支队有近两万人，鲁东北、胶东、鲁东、鲁中、鲁东南、鲁南、鲁西南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达六七万人，山东全省的人民抗日武装已经发展到八万人左右，深受鼓舞，恨不得立即投入战斗。会后，第四支队一部从确峪出发，向莱芜、新泰边莲花山南麓羊流、刘庄，东麓龙廷、土门一带开进，做群众工作，扩大部队。我因尚未分配工作，暂随四支队政治部行动，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位女科长杨纯同志给我配了一位新泰地方干部李春之同志当助手。每次出去宣传组织群众，都带着他一起工作，并对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当他坚决要求入党时，我就当了介绍人。经过一段深入发动群众工作，我们在新泰的土门、龙廷区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组织了十余人参军抗日，在新泰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受到四支队政治部和郭洪涛同志的表扬。扩大的新兵交给了四支队二团三营。

四、整顿、扩大六大队

一天，霍士廉、王文同志找我谈话：“省委要办个干部学校，根据郭洪涛同志的意见，考虑让你去当政治教员，你的意见如何？”我想自己到学校当教员不合适，因为拿笔杆子不行，但到抗日战场组织人民武装拿起枪杆子杀敌还可以，这是自己离开延安到山东敌后的初衷，也符合毛主席鼓励我们到敌后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因此，我恳求组织让自己到新区去开辟工作，只需要组织上介绍个组织关系，指定个活动地点，保证干出成绩来，并恳请霍士廉、王文同志向省委反映自己的意见。隔了几天，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史秀云同志便把省委重新研究的意见告诉了我，拟派我到驻沂水的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任政委，罗绩伟同志去任大队长，吴坤同志任副大队长，要我们共同去整顿、扩大这支部队，并问我对这一工作分配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当晚，郭洪涛同志找我谈话，正式确定我到六大队去，要我首先摸清该大队的情况，并交待了三大任务：一是整顿、扩大部队；二是建设、发展党的组织；三是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说罢，即以省委军事部长的名义，随手写了一封给六大队的信，介绍我们3人前往任职，并嘱咐我们迅速启程。省委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三块现大洋和一些零用铜板做路费。

1938年5月下旬，我们3人从龙廷出发，经蒙阴进入沂水，每天行三四十公里路，一边行进一边探悉第六大队的具体位置，历时4天，终于在距沂水县城约20里的西南方向袁家城子一带找到了六大队。

原来，六大队是1938年初建立起来的，大队长是学生出身的鲁滨，政委是老共产党员邵德孚，政治处主任是学生出身的李仲林。邵德孚和李仲林同志在“西安事变”

前因组织武装起义、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相继被捕，“西安事变”后，他们经张经武同志向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交涉，从国民党监狱里获释出狱，不久由中共山东省委派往沂水等地开展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在山东省委发动全省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他们和日照的范经屈等同志组织沂水北部大小诸葛一带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抗日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后为解决给养问题，全队转移至沂水南部袁家城子一带，很快发展为六七百人的一支大部队。但由于缺乏建军经验，给养问题也未妥善解决，大批战士离队回家，部队尚保有200余人，有待训练和教育，尚需巩固和提高。我们到达时，范经屈同志还在日照活动，鲁滨同志因病在沂水县城就医。见到邵德孚、李仲林同志，我们异常兴奋，一路劳累消失得一干二净，当天就坐下来开会；他们也十分高兴，如实地介绍了情况，谦虚地认为自己缺乏带兵打仗的经验，部队建立快半年了还是稀稀拉拉的，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第二天，我们5人到部队看了看具体的情形，确如邵、李两位同志所介绍的那样。不过，当时最为迫切、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几百名战士的吃饭问题。

经过研究决定，罗绩伟、吴坤和李仲林同志深入部队同战士谈心，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和邵德孚同志去拜会当地的乡长，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乡公所就在袁家城子村内。乡长姓杨，是位开明士绅。我们进入乡公所，就径直拜访他。邵德孚同志首先向杨乡长把我作了一番简要的介绍，我接着开诚布公地说：“久仰杨乡长是位知名的爱国进步人士，积极拥护抗日救国。日寇入侵山东以来，已接近十个月，上从山东省长，下至许多区乡长，有的逃跑，有的投敌，有的躲避起来，但是杨乡长既不惧日寇，也不怕共产党和八路军，坚守工作岗位，事实充分证明老先生是富有抗日救国之心的。我们之所以登门拜访，首先是表达我军对杨乡长的尊重和敬仰；同时，也是来向杨乡长说明，我八路军四支队六大队是从本地土生土长起来的，是人民的子弟兵，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请求乡长就地筹措帮助解决。”还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申明我军同一切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团结抗战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免于危亡的坚定立场和态度。杨乡长很感谢我们对他的拜访和信任，说他是真诚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帮助当地驻军解决吃粮问题，是地方政府应尽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当即表示马上派人送200斤馒头和30余斤咸菜，先供我们部队活动于袁家城子一带的200余人急需，然后再继续筹措；这一办法虽非长远之计，但部队的吃饭问题总算获得暂时解决。

为了将部队建成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一个整顿方案。首先是建起精干的大队指挥机关。按照上级的命令，大队由罗绩伟任队长，我任政委，吴坤任副大队长，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处主任。大队部设2名参谋，政治处设2名干事，供给处设5—6名供给员和粮秣员，以加强部队的供给工作。其次是整编部队。按现有兵员，将大队驻沂水南部的200余人、120多条枪编为第一、三连和特务连；几天后又将李端甫、李怀德同志从沂北带来的六七十名新兵和20多条枪编为第二连；郭有邻同志从莒县带回的60余名新兵和十多条枪编为第四连。组编后，即时开展基础训练，由罗绩伟、吴坤同志负责军事课的讲授和操演，士气大振。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方。过去回了家的许多战士又重新返回部队，大批青年要求参军抗敌，部队很快由近400人恢复到六七百人。

当时，有十余名女学生由刘浩同志率领，前来报名参军。部队正需要一批知识分子担负文化教育工作，充实战士文化生活，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没有文化的军队是很难打大仗、打胜仗的。因此，这批学生受到了部队的热烈欢迎，对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牢笼投身于伟大抗日战争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为了提高她们的认识和觉悟，我和邵德孚同志专门给她们上课，讲解党的宗旨、路线、纲

领和政策，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相互关系，武装她们的头脑，以利她们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积极发挥宣传员的作用。她们学习热情很高，接受能力很强。学完后，留下几名在队部任文化教员，负责教文化课和唱歌；多数分配到邻近村庄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许多群众都要求报名参军。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抗日积极性，也蕴藏着宝贵的人才，是我们的兵力和干部的源泉，广招新学员开办训练班，则是培养新战士和新干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形式、好办法。认识统一后，我们决定在部队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开办抗日军政干部轮训大队，并以六大队队部的名义发出招生广告，只要积极主张抗日、要求参战参军、身体健康的人民群众都可报名入队受训，不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限制。几天之内，报名者达六七百人，遂编成五个中队。由我任干训队大队长兼政委，邵德孚同志任副大队长兼副政委。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我们除了讲解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及八路军的宗旨，还说明办干训队的总目的是既培训干部又培训参军对象；既培训军队工作干部又培训地方工作干部。规定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明确宣布学员毕业后按自愿原则分配工作的三种方案：愿意参军者，由六大队根据本人条件和斗争需要进行分配；愿意从事地方工作者，可分配到地方工作团；愿意回家乡工作者，可分配回乡就地开展群众抗日救国活动。大家听后都很满意，感到很放心，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相信自己的，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因此情绪饱满，学习认真，严格遵守学习和生活制度。我们也有意识地以延安“抗大”为榜样，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针，发扬“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传统作风，着力培养出一批干部，更好地开创和发展抗战新局面。果然，干训队中就有几位同志提前深入到沂水县以北临朐、安丘边界，以景芝镇为中心，组织起了一二百人、几十条枪的抗日队伍。我们准备请示上级，给他们一个第四支队第二大队的番号。金明同志曾任中共安丘县委书记，开辟了该地工作。

经过近一月的整顿和训练，到6月底，部队扩大到近千人，编为5个连队，加上特务连，共6个连队，拥有五六百支枪，并逐渐涌现出一批干部，可谓兵强马壮了。

刘佐眼中的“马鹿事件”

张玉洪

1985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接到大队政委刘心才同志的电话，说有位老首长要到我们中队看望干部战士。那时我担任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因我们大队刚刚组建不久，条件还不是很好，所以，接完电话心里是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老首长点名要到我们中队，是我们中队的荣誉；不安的是作为部队的最基层，能否接待好老首长心里没底。

老首长名字叫刘佐，原名刘中序，字祥斋，正军职。1921年生，淄博市张店区唐家村人。“七七事变”后，他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参加黑铁山起义部队在第五军第四中队任排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编为鲁中二团任八连连长，在1941年的蒙阴县蔡家庄攻坚战中，“实行连续爆破攻坚战术”一举成功，在全军推广。1944年升任三营营长，参加了解放博山和狙击冲山战斗，两战皆捷。1947年春任团参谋长，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



1979年，烟威警备区司令员刘佐重访石桥战斗遗址

开封诸战役。在淮海战役中任华东野战军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团长，率部攻陷楼村，阻敌永城。渡江战役率三营先头渡江，抢滩登陆，被授予“渡江先头营”称号，解放上海后任七十八师第一副师长，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回国后，历任长山要塞区参谋长、副司令员，领导修建胶东北海岸国防工程，戍边卫疆。1973年任二十六军副军长。1978年任烟威警备区司令员，当选为济南军区党委委员。1980年调任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当选为沈阳军区党委委员，1985年离职休养。

我们中队是连级单位，而大队则是团级，当过兵的人一般都知道，大队多是团级，中队是营级，而我们中队则是连级，属大队的直属中队。刘佐司令员点名到我们中队，后来我才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中队是海军青岛基地二工区一大队的先进单位，1984年我们中队曾被青岛市委授予“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和“军地两用人才培养先进单位”；二是刘司令不知如何打听到我是他的淄博老乡，看来他是想借工作之便叙叙老乡之情。

刘佐司令员是大队政委刘心才和政治处主任吴大贵陪同到我们中队的，中队里我和中队长陈宗礼接待了他。老首长见了我们，对着我说：“你就是张指导员吧，听说你也是淄博人？”我突然听刘司令问我是淄博人，觉得有点意外，立即站起来向他敬了个军礼：“报告首长，我是淄博人。”刘司令见我有些紧张，忙说“坐下，坐下，我们随便聊聊。”接着他又问：“你是淄博哪个区的？”我说：“我是淄川区的。”“淄川区哪个乡的？”我说：“我是太河乡的。”刘司令听我说是太河乡的，他又急切地问：“太河乡哪个村的？”我说：“我是北马鹿村的。”刘司令听说我是北马鹿村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在座的人说：“北马鹿村我可了解，抗战时期我在北马鹿村可是住过一段日子的，张指导员他们村老槐树比较多，据说都是宋槐，有些年头了。他们村街最宽，其次还有三处丁字街，是淄河岸比较大的村庄。我对这个村和村里的乡亲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村的红秫黍煎饼还是很好吃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地方。”本来刘司令员问到淄川区又问到太河乡我就有些吃惊，当又问到我们村时，我就明白刘司令对我的家乡不是一般的了解了，很可能有些渊源。从刘司令的谈话中，才知道抗战时期他就在我们那一带闹革命，而且常驻我们村。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刘司令讲了当年在北马鹿发生的让他终生难忘的不寻常的事件。

话题是大家问到刘司令在淄河流域抗日情况时引起的。刘司令好像思索了一下，对大家说：“那我就从‘北马鹿事件’说起吧。”听着刘司令的叙述，我好像回到了抗日战争中的家乡。

1944年9月，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部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大的调整：小股部队、地方部队都要充实野战部队，当时活动于淄河地区的八路军特务队就在调整之列。淄河地区的八路军特务队共有60多人，队长叫胡立义。特务队人员大多都身怀绝技，会武功，武器配备是每人一长一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枪挂匣子。这支队伍中有的人被称为“草上飞”“飞毛腿”，也有的称“千里眼”“顺风耳”，据说他们能飞檐走壁，穿堂过屋如入无人之境。但这些人以前很多当过土匪，霸气十足、目空无人，而最最让上级头疼的是他们听调不听编。抗击日寇他们英勇无比，但不愿受大部队的纪律约束，并且时有违纪行为。因为存在这些问题，鲁中军区个别领导担心以胡立义为队长的特务队会叛变投敌，决定派武装对其强行整编，并提前以开会为名把队长胡立义召到了临朐软禁。

整编胡立义部队的动员会就在北马鹿村召开。会址在村东东楼子外靠河崖的土台上。土台下面是河滩，河滩栽着高高矮矮不少杨柳树。选定这样的位置，鲁中军区个

别领导是有打算的。他认为，胡立义的部队听调不听编已是早就知道的事，虽然胡立义已提前调离，但他的部下也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这次他们不服从整编，就把他们就地消灭，绝不留后患。整编之前柳树丛中就埋伏了人员，并且架设了轻重机枪。整编动员会之前特务队还是自己的部队，武器当然是不能没收的，这也是收编领导最担心的。土台上排了几张桌子，军区的一个副参谋长，刘佐司令员（当时任营长），另外还有营教导员唐正刚同志台上就坐，特务队呈六路纵队坐在台下。整编动员会由唐教导员作动员报告。当动员报告进行到大约十几分钟的时候，台下一队员突然举枪一下打伤了教导员，唐教导员立即血流如注，躺在了台上。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副参谋长一挥手，树丛里的轻重机枪同时开火，一刹那特务队60多人死的死伤的伤，全部倒下了。突然的变故，60多个好同志白白地丧失了年轻的生命。

刘司令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真是不应该啊，一人有错牵连了多少无辜，当时我想制止都来不及了。”事情发生了，损失和影响是不能挽回了，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痛。刘司令员停顿了一下又说：“听说井同村一个同志刚参军还不到三天。”

整编会过后的事刘佐司令员也可能知道，但他没有说。

这事件自然也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1986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就这事走访了几位老人，他们对这次事件记得也比较清楚。我的本家九叔张英乐对我说：“这件事我们村年长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你三大爷运了一夜尸体是千真万确的。”九叔又说：“抗战后期日本鬼子更加疯狂，这可能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吧，反正那时形势非常严峻，老百姓一听说有队伍来，不管是什么部队都提前到野外躲避。整编会的那天下午，老百姓和往常一样提前躲避了，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你的三大爷张英贤从小耳聋没有走。开会前部队就对村庄戒严了，事件发生后，他被叫去拖运掩埋了一整夜尸体。从马鹿村到淄河对岸的小东峪口来回三里多路，他们八个人整整忙活了一个通宵，血水汗水湿透了衣裳。特务队的人员除几个受伤的被送到医院救治外，死了的在小东峪口的三分地挖了个大坑全部埋在了里面。”

后来听说胡立义同志被召往鲁中军区后也被枪杀。胡立义队长被枪杀，他的部属被消灭是抗日战争中发生的一起冤假错案，中共淄博市委组织部1986年按照国发（1983）91号文和鲁组（1986）7号文件规定，为胡立义同志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但是特务队队员被当作叛军屈杀的事却至今无人过问，他们的尸骨无人，也无法认领。

66年过去了，记得这次事件始末的人也不多了。特务队员中许多人为抗击日寇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因为个别领导做出的错误判断，执行的错误决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实在可悲，可叹。

愿长眠地下的蒙冤烈士永垂不朽！安息吧，人们不会忘记你们。

相关链接：

胡立义（1915~1944），今淄博市张店区沅水镇炒米村人。他生性暴烈，狂傲不羁。1937年，张店沦陷后的一天，一汉奸到炒米村为侵华日军派差要物，年方22岁的胡立义听说后火冒三丈，只身奔前，击毙了汉奸，并缴获手枪一支。立义之父见儿子如此勇猛，亦拿出家中用以护宅的部分枪支，支持儿子组织抗日队伍。立义遂前往淄川县，动员一位张姓表叔，使其不仅献出家中的两支匣枪和一支长枪，而且让儿子跟随立义去抗日。起初他们只有五六个人，后来，通过夜袭湖田、金岭车站的敌伪据点，用缴获来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队伍很快发展到十几人。

黑铁山起义后，胡立义率队投奔，编入第三支队。整编后，又奉命返回家乡活

动。

1938年胡立义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三支队特务队队长，队伍发展到百余人。他率领队伍经常活动在胶济铁路沿线，毁路炸桥、袭击日军据点和汉奸维持会的驻地，搞得敌人恐慌不安。胡立义精明强悍，枪法极准，双手使两支匣枪，百发百中，被人誉为“神枪手”。1938年8月，他先后三次带队摸过敌人设在张店龟驮碑处（今东货场西南侧）的岗楼，使敌人闻风丧胆。

1938~1940年，胡立义活动的范围，由周村到辛店的铁路沿线，扩展到淄川、洪山、博山一带。一次夜袭淄川城，活捉了维持会长；一次夜袭洪山煤矿（当时叫大荒地）时，缴获了一宗炸药；一次夜袭湖田车站，消灭伪军两个班，缴获长短枪十几支。特务队接二连三的偷袭战，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有些汉奸害怕特务队收拾他们，所以，虽然身处敌人营垒，却乖乖地听从胡立义的指挥，要钱送钱，要物送物，不敢怠慢。在我军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胡立义经常通过这种关系，弄来武器、被服和医药，资助了军需。

1940~1943年期间，我军南北联系、物资交换和护送过往干部，必须通过日伪军构筑的胶济铁路封锁线，这些艰难重要的任务，非胡立义莫属。每次过往岗楼，只要一提胡立义的大名，鬼子汉奸均退避三舍。有一次，杨国夫司令员授令向山东分局护送一宗金银，胡立义率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杨司令的表扬。

胡立义侠肝义胆，勇猛无比，敢作敢为，是有名的孤胆英雄。但是，胡在政策纪律方面也存在不少缺点。由于原益都县四区区长邹岷山（与胡立义是姑表兄弟）叛变后，当时鲁中军区的个别领导，怀疑胡立义与敌暗中勾结，担心他变节投降，于是在1944年秋，错误地将其处死，使胡立义之忠魂在九泉之下蒙冤40余载。直至1986年12月，才得以平反昭雪。

沭河两岸战火中的普通孝事

王宗富

孝道源远流长，孝心之树常绿，孝心之花常开。战火中的孝心故事更是代代流传，成为沭河两岸红色基因画廊中的壮丽一页……

五块银元

1941年冬天，驻山东滨海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老四团的一名姓孟的小战士，在赴敌占区沙河镇一带侦察敌情时身负重伤（沙河镇现属于连云港市赣榆区），被战友背回沭河北岸的小埠子村时（小埠子村当时属于临沭县，是老四团一个连的驻地，现属东海县）人已昏迷不醒，而师部医院离这儿又比较远，情况紧急。村里有位乡村医生，医术上有一套，在他的抢救下，小孟终于苏醒过来，躺在床上的小孟，断断续续地对连长说：“连长，我回不去了，我，我想娘。”

连长点点头：“小孟，我知道你是山西人，娘子关那儿的，我也是山西人，雁门关附近的，咱们是老乡！”

“连长，我娘还不知道我在这儿，我是在煤窑挖煤时当兵的，八路军经过那儿，我听说当八路不但能打小日本，还能吃饱肚皮，便和几个人溜了出来，参加了八路。”

“小孟，好兄弟，伤好了，我们肯定能打回老家去！小孟小孟，你怎么啦，你别吓我呀！”

小孟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起来……

“连长，你扶我起来，咱娘子关在什么方向？”

“小孟，从这儿看，应该是在西北方向吧！”

“你扶我起来，我10岁时父亲便没了，家中只有咱娘一人。我给老娘磕个头，尽个孝心吧！”

泪水涌满了连长的眼眶，周围战士也都流泪了。

连长叫两个战士扶着小孟，朝着娘子关所在的西北方向，点了三下头。周

围的战士也都齐刷刷地跪了下来，朝着隔着千山万水的娘子关，朝着根本看不见的娘子关，朝着感情割舍不断的娘子关，朝着那位并不相识的老娘——那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的老娘，郑重地磕了三个寄托相思的头……

小孟的脸色又慢慢变黄了，眼睛也失去了光彩。

“小孟，小孟，你怎么啦！”

“连长，我这贴身口袋里，还有5块银元，是在煤窑里挖煤挣的，原打算以后回家交给老娘的，尽份孝心，现在不行了，我回不去了……”小孟声音有些微弱了。

“小孟，小孟，你放心，我们要把你治好，你会回老家的！”

小孟摇了摇头，“连长，我回不去了，你把这银元托人转交给我娘，我娘叫王秀英，娘子关南面的，离娘子关55里，村名叫……”说着，说着，小孟的声音渐渐模糊，头也慢慢地沉重地往一侧歪了过去……

泪流满面的连长紧紧地抱小孟在怀里，深情地说：“好兄弟，相信我，我一定会把这事情办好的，咱山西人上孝国家，下孝父母。这5块银元，我先交给团部暂时保存，等打回山西，我就去亲手交给老娘，替你尽这份孝心！”停了停，他又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八路军再苦再难，流血牺牲，也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这是为国家尽孝，替国分忧。小孟兄弟从山西娘子关打到这里，在这沭河岸畔为侦察敌情献出了生命，行的是大义大孝，小孟兄弟是国家的孝子，娘的孝子……小孟的娘亲，就是我们的娘亲，我们全连的娘亲！”

周围的人也都留着泪齐声喊道：“小孟兄弟，你的娘就是我们的娘，就是我们全连的娘！”声音弥盖了沭河，直冲云霄，向远方飞去……

山沟村夜话

沭河两岸老一辈人都知道抗战时期此地有个土匪叫王二麻子，王二麻子经常在沭河两岸打家劫舍，趁夜黑风高之际，在沭河南岸磨山一带的山林中呼啸出没，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当时住在西边不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老四团于1941秋收编了王二麻子及其匪徒30余人，通过思想教育，通过整训，王二麻子及其属下被编为一个排，王二麻子任排长。

王二麻子的老家在沭河南岸的山沟村，早年丧父，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人。母亲王高氏深明大义，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曾同她谈过话，夸她是一位懂大道理的母亲。说日本鬼子犯我疆土，杀我同胞，掠我财富，每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站出来。你儿子以前是被逼为匪，现在成八路军了，打日本鬼子了，你应该感到光荣……

谁知一天晚上，王二麻子带了几名部下，竟悄悄回到了山沟村，在家中昏暗的油灯下，脸上铜钱大的麻子显得阴沉沉的。这王二麻子颇有孝心，一进屋门，便对母亲说：“妈妈，这事是件大事，我必须跟您老人家说一声，您点头了，今晚间我就不是八路军了！”

“为啥？”王高氏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八路管得太严了，今天中午我带了几个弟兄去喝了几两酒，连里便训我，说我自由散漫，缺乏纪律性，缺乏敌情观念……妈的，尿盆子一个一个，全扣上来了！”

“就为这个？”

“妈！还能为啥。西面马陵山高林密，谷深坡陡，我和弟兄们想到那里去！”

王高氏禁不住呵呵大笑了，说：“傻儿子啊，你入了八路，就应该服从人家管。”

你以前自由惯了，现在像小鸟入了笼子，不适应呢！儿子，你光孝顺我还不行，还应该孝顺咱们这个国家哪！你孝娘一人是小孝，孝咱国家是大孝哪！现在国难当头，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八路军是干大事的，干大事没有纪律能行？打鬼子没有纪律，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能行？”

“妈！我也想为国尽孝啊，可人家拿咱不当人看待呢！”二麻子满肚子的怨气。

“儿子啊！妈数落你，是不是也不拿你当人看待了？”

“妈，你怎么这么说，二麻子永远是妈的儿子。惹您生气，是儿子的不孝！”

“儿子，八路军数落你，不但是拿你当人看待，还是拿你当好人看待呢！你坏透了，没用了，是块烂木头了，是块臭石头啦，油盐不进，人家还数落你干啥？那样还有用吗？数落你，是想叫你改掉坏习气，带好部队，同八路军一个样，好同鬼子打仗呢！”

“妈，那我咋办？”

“你自己想咋办？”

“那不西上马陵山了？”

“那里有鬼子？脱离八路，避开鬼子，重当土匪，实际上就是帮了鬼子的忙，会让人耻笑一辈子，当妈的脸上也无光，抬不起头来！”

这便是当时传说得很广的山沟村夜话。一位普通母亲，在山村里的母亲，同儿子的一次至关重要改变儿子命运的谈话。

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里，在抗日烈焰燃遍苏北鲁南的关键时刻，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同仇敌忾奋起抗日、山东大地如火如荼的时刻，一位年过五旬的妈妈，抓住儿子深有孝心这一基点，以自己胸中朴素的道理，启发儿子，开导儿子，使儿子逐步消掉怨气，抛弃匪气，融入到八路军的洪流中来，融入到当地抗日的日益高涨的烽火中来……

这真实的故事已成为当年滨海区抗日战争的一页历史。

当时的山东滨海区海陵县磨山区妇救会、山沟村妇救会都表扬了这位以国事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讲大孝的妈妈。住滨海区的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还以此为素材，编了一个吕剧——《山沟村夜话》，在沭河两岸流动演出，大受欢迎，影响很大。

二麻子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部队开赴东北战场，牺牲于四平街战役中。在野战医院弥留之际，已当上连长的二麻子对部队的领导说：“妈妈年龄大了，经不起精神上的刺激，我走后，千万不要告诉妈妈……”直到部队领导含着眼泪点头，这位孝心荡胸的汉子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注：

- 1.小孟：名字叫孟宪重。
- 2.二麻子：名字叫王大响。

曾国华传 (一)

晓冰岭上梅



第一章

曾国华，1910年10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岐岭街（镇）。这是一个地处山区的小圩镇，当时的岐岭是商贸繁华之地，商贸枢纽中心。

父亲曾文山，在本街商会当会计，是一位不问政治、不信宗教、安分守己的市民，母亲王氏是客家家庭主妇。兄弟姐妹12人，他排行老十，上有3个哥哥和6个姐姐，下有1弟1妹。家中吃闲饭的人过多，父亲的微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曾国华3岁时，父母将其卖给本镇姓吕名官臣的人作养子。吕家有房屋3间，耕地数亩，吕官臣是个风水先生并吸大烟，他常去南洋东南亚国家等地靠着风水维持生活。吕之妻钟氏，在家务农，靠种地过日子。他到吕家第二年，钟氏又生一子，当其长到五六岁时，年仅10岁的曾国华就变成整天挑水、打柴、放牛、割草的小长工，过着挨打受骂，食不果腹的日子。他明里不敢反抗，却知暗地报复，伺机痛打钟氏之子，以泄已愤。钟氏之子长到7岁时患病死去，曾国华曾暗里高兴，一度幻想吕家会转变对他的态度，却不知钟氏更痛恨于他，打骂有加无减。有一点改变的是在曾国华11岁时让他在夜校和初小念书。吕官臣回家又讲些封建落后的旧道德旧礼教，什么天地君亲师，不忠君主、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天诛地灭，等等。在学校里，在邻里同伴中，又因自

已是卖给人家的“丢儿”，是吕姓人的“杂种”，常受讥笑和讽刺。家庭的虐待，邻里的侮辱使他无法忍受下去，就萌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1924年适逢北伐军一部来到家乡，14岁的曾国华就背着吕家，伙同几名伙伴一起投笔从戎了。

从军不久，曾国华所在的部队就与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合编，两年以后部队开始参加北伐战争。此时的曾国华年幼无知，还不能扛枪打仗，只能当干杂活的勤务兵，虽然常受军官的训斥和打骂，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热闹，对他很有吸引力，一晃两年就过去了。部队打到山东时，张发奎反蒋把部队撤回广东。曾国华所在的旅未来得及走，即被蒋介石改编为独立第四旅。1929年该旅驻南京地区时组织兵暴被察觉，除一部分突围拉到苏区与红军会合，其余大部分被缴械，排以上军官部分被杀，部分开除，曾国华等士兵全部被押送杭州南新桥集中营关了6个月。1930年爆发蒋冯阎战争，曾国华等被编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当兵。蒋冯阎战争结束后，部队开到徐州九里山军营驻扎时，又有一个连发生兵变，将军官杀死后拉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曾国华随着年龄增长，又经历这些反叛国民党军的事件，虽然还不大懂革命道理，但已对国民党军队打骂士兵、欺压百姓、克扣军饷等恶劣行为产生不满，开始不安于白军的日子而向往红军了。

1931年春，国民党五十二师开往江西围剿红军。在峡江埠田一带驻防4个月没有见到红军，却看到到处是红军的标语、告白军士兵书：“红军官兵平等”“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为穷人谋解放”“蒋介石是叛变革命的卖国贼”等。在红军的宣传和苏区群众的影响下，国民党五十二师不断发生成班成排的“兵暴”。曾国华目睹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百姓的抢掠和残杀，又身受军官的训斥和打骂，耳闻红军“官兵平等”“军民一家”等，他要逃出白军，投向红军的心愿已经急不可待了。一天晚饭后，见班里无人，他一把拉住情同手足的张大个说：“兄弟，咱们走！”“好！听你的，咱再拉两个！”张大个心领神会。可是干这种玩命的大事，他们难免神态失常，终被连长怀疑，因无证据，只好以补充缺员为由将全班解散，曾国华的班长职务也随之丢了。但是连长对曾国华总是不放心，一次因他归营晚，把他痛打一顿，又禁闭了3天。这时的曾国华已是铁心要投红军，但不知红军在哪里，怕被苏区赤卫队抓去杀害。1931年6月，国民党五十二师进到苏区东固、兴国一带围攻红军。被红军牵着鼻子来回绕圈子1个多月也未找到红军主力。9月，红军主力在方石岭、东固山一带包围了五十二师。曾国华又组织3人伺机逃跑，因被发现而被关押起来。当晚红十一师发起进攻。五十二师被击溃，曾国华被解放，从此参加红军，走上革命的征途。

第二章

1931年9月，曾国华被分到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连当战士。这是一支集南昌起义的“北伐铁军”和湖南秋收起义军的英雄部队。这时驻于坪山休整。在这支英雄部队里，曾国华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和锻炼。“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情同手足的官兵一致的革命风气，对于来自贫苦家庭、在白军里受过欺压的曾国华来说，倍感亲切，如饥似渴地吸收。他深信自己真正找到了出路，精神振奋，全身轻快，觉得苏区的天特别晴朗，人也特别亲切，他高兴得走路都带小跑。3个月后，红十一师奉命到瑞金东北石城县境内，消灭那里的反动武装，以保卫“红都”瑞金的安全。曾国华在红军里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在战场上他可是个老兵，在攻打豪绅地主武装盘踞的老巢红石寨战斗中，他冲在前面，勇猛拼杀，打死几名土匪还缴获两支步枪，受到连首长的表扬和同志们的称赞。1932年2月，曾国华所在的红十一师在师长周昆、政委张赤男率领下，随红四军在赣州新城与敌独立混成旅展开一

场恶战。部队进攻中受阻，伤亡较大。曾国华也负轻伤，依然坚持战斗。在激战中，阵地上传来师政委张赤男为掩护战士不幸牺牲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愤，阵地上为张政委报仇的喊声此起彼伏。曾国华在掩体里忽见团首长挥着驳壳枪跳出掩体，口喊冲呀！与连排干部一起带领战士们冲向敌群。他完全忘记伤疼，汇合在这股不可阻挡的铁流中一举拿下新城。

战斗结束了，部队还沉浸在失去好政委的悲痛之中。曾国华的心更不平静，思绪万千：来红军这半年亲身感受群众拥护红军，干部爱护士兵，和国民党军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白军里干了6年多，打仗时别说师团长，连营长也见不到，在红军团长带头冲锋，师首长为掩护战士牺牲了自己，共产党真正的伟大。他越想越激动，已经心存好久的入党念头更加迫切了。1932年2月部队在青龙镇休整时，由支部委员黄龙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4月，红十一师参加攻打福建龙岩和漳州战役。新入党的曾国华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处处起模范先锋作用。4月17日，向漳州行军途中，遇到山洪爆发，河流湍急，部队受阻。曾国华依仗自己强壮的身体，身背两支步枪，腰系绑腿拉着体弱矮小的同志过河。4月19日，红十一师攻打漳州外围天宝山阵地时，三十一团受命断敌退路。当敌人逃跑时，曾国华在红二连里冲在最前面，和战友们一起追得成群的敌人放下了武器。部队进到漳州城内，饥渴交加。曾国华嗓子冒烟，嘴唇干裂，眼见街头叫卖水果，他自觉遵守红军的群众纪律，摒弃白军中那种抢拿群众东西的恶习，见到个别吃水果不给钱的同志还主动去劝诫。曾国华这段时间的表现，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被认为“是一位不错的同志”。

1932年9月，曾国华升任红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连班长。

1933年春，在近3个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中，曾国华在红十一师的队列里，冒着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爬高山穿密林，日夜兼程，先后参加了歼灭白军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以及草台岗歼灭白军十师等战役。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一口气都没喘，又受命攻打乐安县城。由于敌城防工事坚固，碉堡林立，火力凶猛，红十一师的战士虽然英勇顽强，前扑后继，但屡攻不下，伤亡惨重。攻城第二天，曾国华被炮弹皮击中下颚。他被扶到民房后面，卫生员在包扎时发现弹皮嵌在肉里，必须拿出来。当时没有手术刀，没有麻药，也没有消毒酒精，卫生员从老百姓家里借来菜刀，让两个战士把曾国华摁在地上，用自带的白酒消毒，用菜刀割开伤口，把弹皮取了出来。曾国华一边擦着满头大汗，一边说：“这不像杀猪一样啊！”因伤口有感染不易愈合，他休息两个月才回到部队。

1933年6月，红一军团在江西永丰县的藤田进行整编。曾国华所在的红十一师编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这时他升任红五团一营二连排长。

1933年8月1日，红一方面军举行全军运动大会。红五团代表红一军团参赛。经过军事比武、政治测验、文化考试、体育竞赛等20多个项目的考核和比赛，红五团在2个项目中拿下17项第一，夺得团体总分第1名。曾国华参加跳高获得第1名，为五团争得1分。授奖大会上，为表彰红五团在部队全面建设上取得优异成绩，以及在全军运动会上的突出表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命令，授予五团“模范红五团”的光荣称号。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亲自将绣着“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红五团”的锦旗授予红五团，站在红五团队列里的曾国华看着手举红旗的团政委刘忠回到队前，眼含泪花，顿觉作为红五团战士的光荣，责任的重大。就在这次运动会上，红二师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认识了曾国华。刘亚楼握着曾国华的手说：“好啊！曾国华，你能跳高，听说你打仗也很猛。”曾国华听了深受敬重的老首长的鼓励，心里热乎乎的。此后30多年(除刘在国外)他们一直战斗在一起，直到1965年刘亚楼逝世时，他还清楚地记得

当年的情景。

1933年10月，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军事路线指挥下，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为收复失守的黎川，红一军团发起云丰、大雄关战斗。为抢占大雄关的制高点，红二师以红五团为先锋与敌吴奇伟部展开殊死争夺。曾国华带领全排坚决执行命令，勇猛冲杀。但敌人在飞机掩护下，火力过猛，五团伤亡惨重，前进困难。曾国华小腿中弹，好在没伤到骨头。在包扎伤口时，又听到师政委胡阿林在前沿阵地牺牲，团长朱瑞秋身负重伤，政治处主任牺牲，师长陈光也右臂负伤，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但是当时还不清楚是上面指挥上出了毛病，只是想“不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么，怎么死拼呢！”

1934年4月，曾国华升任红五团二营六连连长。4月中旬，敌军大部队向广昌推进。红一军团展开了保卫广昌战役。“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路线，“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把红军害苦了。曾国华带领六连和全军的部队一样，在“死保广昌”“寸土必争”的口号下，蹲在工事里等到敌人距离200米时跳出战壕发起冲锋，一批一批倒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眼看团长曾桂牺牲，战士们红了眼，死打硬拼，顶了半个月。曾国华走在撤出广昌的队伍中伤心流泪，低头沉思，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撤出广昌后，部队休整一段时间。曾国华又参加了保卫宁都、保卫兴国的战役。但是宁都失守了，仗越打越差劲，根据地越打越小，部队越打越少，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低，陷于苦闷的日子里。

1934年10月16日，部队奉命“转移”。红五团在江西省于都县穿心店突围，过于都河，走上长征路。曾国华当时并不清楚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征在此时此地开始了。

长征开始，红一军团担负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红二师是军团的左前锋，夜行晓宿，经过多次不算激烈的战斗，通过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11月下旬，红军要突破蒋介石40万大军以湘江为屏障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红二师受命占领湘江西岸，掩护全军过江。红五团抢渡过湘江后就在西岸脚山铺、尖锋岭、黄帝岭、白沙一带阻击敌人。曾国华知道这是一场关系红军安危的战斗。11月30日拂晓开始，敌军以16个团的兵力向红二师的阵地轮番进攻。敌机的轰炸，炮火的轰击，机枪的扫射，整个阵地一片火海。曾国华率领六连在火海中同敌人死打硬拼，寸土必争。为了节约少有的子弹，只能等敌人靠近，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打，打垮一批又一批，战士们打红了眼，早把生死置于脑后，最后展开白刃战。曾国华一面指挥连队，一面拿起通信员的步枪，连刺两个敌人。阵地前敌人横尸遍野，血肉横飞。血战7天6夜，红二师没让敌人靠近湘江西岸，保证中央机关安全渡江。红五团最后撤出战斗，伤亡惨重。曾国华望着100多人的连队只剩60几人，排长、班长牺牲的、负伤的，所剩无几，通信员、卫生员都没有了。曾国华的军帽打了一个洞，战士们说：“子弹有眼，不打连长。”曾国华面对战后的惨景，笑不出来，心在流血。

全州战役后，红二师突破乌江，智取遵义，掩护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有名的遵义会议后，曾国华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二次攻占遵义战役，歼敌两个师8个团。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一扫部队连吃败仗的晦气，大大振奋了军心。

这次大胜，红军获得几天休息。在仁怀县一个镇子里，曾国华听了军团政委聂荣臻向红二师基层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宣布毛委员又统率全军时，会场热烈鼓掌，个个热泪盈眶。曾国华兴奋至极，同身旁的战友说，“这段时间心中郁闷的疑团总算解开了。”

1935年3月中旬，曾国华带六连参加了攻打遵义西鲁班场战斗。之后，师政委刘亚楼亲率红五团按毛委员的指挥调动敌人：三渡赤水，佯渡长江，四渡赤水，逼进

贵阳，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把亲临贵阳指挥、妄图消灭红军的蒋介石搅得晕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曾国华和他带的六连虽然行军疲倦，战斗频繁，但得知红军终于跳出敌人的重围，大家松了一口气，都说：“没有白走路，毛主席用兵有高招。”1935年5月，红五团由左权、刘亚楼率领作为第二先遣队抢渡大渡河。6月又连续翻越四座雪山，7月初抵达毛儿盖。曾国华带领六连除了在懋功吃了几顿饱饭，其余日子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曾国华在战士中倡导互助活动，体强帮助体弱的，年龄大的拉着小的，虽然大家体力消耗很大，但很少减员掉队。这时部队开始作过草地的准备。曾国华在一次“打粮”时没有按时到达地点，团长一火朝他打了一枪，幸好没有打中，但把他的情绪打没了。进入草地后，曾国华面临茫茫无边的沼泽地，眼看随时陷进泥潭、饿倒在路边的同志，思想激烈地斗争着。“这是往哪里去？这样走下去不打死也得拖死啊！”他真的有些泄气，工作也不那么认真了。在担负收容任务时，战士报告有个掉队的营长不行了，他默许丢下了那位营长。这件事他十几年后还感到内疚。但当时他又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负过四五次伤，血不能白流，不能掉队，还有中央首长在一起，自己怕什么。思想又稳定下来，硬是撑着身子，咬着牙走出了草地。在吴起镇休整时，骨瘦如柴的曾国华见到老首长刘亚楼。“曾国华你怎么瘦成这样！”刘亚楼握着他的手继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曾国华听了老首长的话心中又热乎了一阵子。

1935年11月中旬，曾国华参加了歼灭东北军一〇六师、一〇九师的直罗镇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也改善了部队的装备。曾国华参加了在杨泉源召开的祝捷大会。“直罗镇大捷是党中央安在大西北的奠基礼！”毛泽东的讲话在曾国华的耳边久久回响。他为参加这一重要战役感到荣幸，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恢复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1936年1月28日，曾国华参加了红军东征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动员。会上“打过黄河去，打倒阎老西”“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口号此起彼伏。会上宣布：红一军团为右路军，红五团为右路军的先遣队。曾国华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命令，一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摩拳擦掌。

2月中旬，红二师抵达黄河西岸陕西绥德县沟口，紧张进行临战训练和渡河准备。为保证红五团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团长张振山从全团选拔24名优秀干部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师长刘亚楼提议曾国华任突击队队长。下分4个突击组，队员年龄最大约20岁，最小的15岁，都是经过长征考验的铁汉子。

曾国华领受突击队长的任命，他暗自思量，这既是领导对自己过去战斗表现的肯定，也是对自己担负如此重担的信任。他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的重托。2月19日，突击队的干部打扮成陕北农民模样，身背粪筐，肩扛镢头，跟随团长张振山前往黄河边熟悉地形，受领任务。

曾国华一行来到河畔一座小土屋前。军团长林彪、师长刘亚楼等人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对岸。曾国华一愣神，还没来得及报告，刘亚楼就向林彪介绍：“这就是曾国华，突击队长。”“好！快进来坐，都进来。”林彪一面同曾国华握手一面说。曾国华一看这阵势有点紧张，军团长都亲自来了，可见这任务多么艰巨。

唐代忠烈典范颜杲卿

魏宝玉



颜杲卿（692—756），字昕元，一字孔思。生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费县）。与颜真卿同为十六世祖，颜元孙次子。以文儒世家。

《新唐书·颜杲卿传》有记载：“杲卿以荫调遂州司法参军。性刚正，莅事明济，尝为刺史诘让，正色别白，不为屈。开元中，与兄春卿、弟曜卿并以书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迁范阳户曹参军。安禄山闻其名，表为营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七日，时任河北、河东采访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亲率大军15万长驱南下，十九日便下博陵，随后攻占蒿城。颜杲卿当时因准备不及，兵力不足，未能抵抗，被迫与长史袁履谦前往迎接。安禄山赐他金紫袍，而把颜杲卿的子弟带走做人质，仍让其做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并派心腹李钦凑率兵7000把守常山附近军事要冲土门，以拦截由山西东进的唐军。颜杲卿由蒿城回常山的路上，指着身上的金紫衣对长史袁履谦说：“为什么要穿它？”袁表明了他的忠意，颜杲卿为了保存实力，表面上接受了安禄山的安排，暗地里加紧进行起兵讨伐叛军的准备工作。当平原郡太守颜真卿派杲卿的外甥卢逖来联系，约其一同讨伐安禄山时，颜杲卿正好也派出三子颜季明前去平原郡颜真卿那里联系。同年12月，叛军攻陷东都洛阳，颜杲卿为防止叛军直攻潼关，危及关中，假托安禄山之命，计杀了贼将李钦凑，生擒其部将高邈、何千年，收复了土门，扫清了河北、河东之间的通路。颜杲卿起兵反政的消息传到河北各郡后，河北17郡纷纷响应，复归朝廷。这时河北跟随安禄山叛乱的只有范阳、密云、渔阳、卢龙和邺、汲6郡。河北各郡响应颜真卿、颜杲卿共举义旗，反抗“安史之乱”的军队，一下子增加到20万人，并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合兵

20万，在堂邑大败叛军，取得“安史之乱”以来唐军的第一次胜利。

颜杲卿在常山起事成功后，立即派长子颜泉明等人赴京呈献李钦凑首级，并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内丘县张通幽之兄张通儒为安禄山宰相，张通幽泣求与颜泉明偕行，以救其宗族。颜杲卿出于同情，准其与颜泉明同行。但一到太原，张通幽便忘恩负义，竟唆使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扣留颜泉明等使者和常山郡捷报。王承业另写奏章，把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另派太原亲信赴京上奏。后遣颜泉明回常山，而密令壮士翟乔扮贼伏于路旁谋害颜泉明。翟乔出于义愤，将密谋告之颜泉明，才幸免于难。太原使者到长安，玄宗大喜，即拜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其部下无功受禄者数以百计。朝廷任命颜杲卿为卫尉兼御史中丞。叛军攻下洛阳后，安禄山准备亲率人马攻打潼关，走到陕虢（今河南灵宝），听说河北生变，心中着慌，不敢再继续前行，急派史思明、蔡希德各带一万人马渡河，分两路向北猛攻常山。由于常山起兵刚8天，守备工作来不及做好，史思明的叛军已兵临城下。大兵压境，常山寡不敌众，颜杲卿向太原告急，王承业因冒功受赏，怕将来败露，故意拥兵不救。颜杲卿率常山军民苦战三天三夜，直到粮尽矢绝。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初八日，常山城陷，史思明纵兵屠城，杀死守城军民一万余人。颜杲卿最后被执，在叛军的百般利诱、威逼下，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叛军无计可施，将颜杲卿的幼子颜季明押来，加刃于颈上说：“降我，当活尔子。”颜杲卿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叛军恼怒，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儿子颜季明和外甥卢逖。颜氏一家死于刀斧之下30余人，可谓一门英烈。颜杲卿与袁履谦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处，安禄山见了怒斥道：“我提议让你做判官，没几年就越级提拔你当太守，有哪点对不起你？你居然反抗我！”颜杲卿对叛贼安禄山骂道：“你本是营州放羊的羯奴，天子特意让你当三道节度使，恩德无比，哪里对不起你？而你居然作乱。我家世代为唐臣，官职都是朝廷授予的，虽然你曾为我说了一些好话，我难道就要跟您作乱不成？我为国讨贼，恨不得杀了你，怎么说我是反叛呢？臊羯狗，何不快点杀了我！”颜杲卿历数其罪，叱骂不已。安禄山大怒，喝令将他和袁履谦两人绑在洛阳桥头柱上，先砍断其一条腿，节解以肉啖之。颜杲卿至死大骂不息。安禄山下毒手钩断其舌头，气冲冲地问：“复能骂否？”颜杲卿至死不屈，竟被活活支解而死。“杲卿刚烈，靡躯殉国，舍生取义，自古罕俦”，时年65岁。袁履谦也被凌迟处死，同时惨遭杀害的还有颜杲卿的幼孙颜诞、侄子颜诩等。

颜杲卿与从弟颜真卿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作用虽不及郭子仪、李光弼等，但为挽救李唐王朝的灭亡、维护李唐王朝的统一，使广大人民免遭战乱之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他们兄弟二人点燃了平叛烈火，振奋了民心；颜杲卿壮烈殉国，在反对分裂斗争中，颜氏一门英烈惨遭叛军杀害的悲壮情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平叛的斗志和决心，为李唐王朝取得平叛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郭子仪、李光弼收复常山后，从狱中释放出颜杲卿的亲属数百人。后颜真卿派颜泉明等到洛阳寻得颜杲卿等人的尸骨，收其安葬到长安凤栖原。

颜杲卿遇难后，奸相杨国忠相信张通幽、王承业的篡改事实，竟然没有一点表彰。直到颜真卿做了御史大夫后，向肃宗皇帝哭诉了此事，肃宗告诉了太上皇玄宗，才杖杀了张通幽，并追赠颜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封其妻崔氏清河郡夫人，颜季明、卢逖及被害宗子皆赠五品官。任命其子颜泉明为郾县令，颜威明为太子仆丞。

颜杲卿忠贞不屈、壮烈殉国的精神深深感染和影响着手足的从弟颜真卿，以致后来又成为抗拒李希烈叛变，以身殉国的忠烈典范，与其从兄颜杲卿并称颜氏“双忠”。

清《费县志》载有颜真卿撰《颜杲卿墓铭》：

赠太子太保，谥“忠节”、朝散大夫颜杲卿墓铭，铭曰：

太保烈烈，抗兹忠节。殉国义形，见危身杀。
元宗杖信，售诈凶羯。寇极灾挺，称兵向阙。
河朔鼎沸，潼关昼闭。天下寒心，王旆若赧。
蛇豕十万，淬如霜雪。公以眇身，毅然奋发。
逆党株连，士门披扶。人知效忠，国用不艱。
恩宠三座，荣加九列。王命来临，孤城已灭。
身悬锋刃，口誓不绝。先圣感忠，保储赠揭。
刻诸金石，恩表墓缀。远莫致之，留斯江湓。
日月有既，微猷无缺。

山东费县是琅琊颜氏发祥地，颜杲卿祖居地。颜杲卿殉国后，颜氏族人和故里人民感其忠节、敬其伟烈，首先在琅琊颜氏祖茔——费县颜盛林建颜杲卿墓，与后来的颜真卿墓并称“二颜墓”，远近族人春秋来此祭祀。在诸满建“二颜祠”（亦名鲁公庙）、“双忠桥”以志纪念。宋元祐六年由诸满迁址于县城沂河东岸的鲁公庙，因庙内实祀着唐忠节公颜杲卿、文忠公颜真卿塑像，故于清康熙四十三年，费县知县朱约将鲁公庙改称“双忠祠”。祠内有一副楹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其遣词精巧，对仗工整，道出了世人对忠节、文忠二公的赞美。清《费县志》载有题谒“双忠祠”的多篇诗文。例：

谒双忠祠

[费县知县]朱约（宝应人）

天宝雄藩首范阳，兼镇节度除郡王。
寇极骄生遂跋扈，郡邑蹂躏势莫当。
常山太守忠义性，整戈缮甲计初定。
未及贼垒环城池，告急邻封缓不应。
矢穷粮尽城已摧，骂贼捐躯气犹劲。
一死足以酬主恩，芳名直与日月并。
平原涂土血泪流，招讨河北歼国仇。
闲关履险归行在，立朝侃侃宣嘉猷。
位望愈隆忌愈甚，奉使希烈遭拘留。
三载臣节终勿夺，杀身成仁复何求？
二公祠宇青山麓，懔懔如生唐冠服。
春秋祭享近千年，节同祀同祠名独。
庚辰受命来东蒙，揭以“双忠”更旧牖。
庭前老干挺寒松，绿荫苍苔风谡谡。

谒双忠祠

王式丹（宝应人）

范阳贼兵天下雄，挫其锋者两颜公。
常山平原如指臂，义旗遮蔽山以东。
西连张许势犄角，牵掣贼肘堪贼胸。
藉非哥舒一战误，岂有火及骊山宫！
中原瓦裂纵无补，缓赋西上已奇功。
常山殉国自犁舌，鲁公爵秩方尊崇。
讵意白头值蓝面，贼庭洒血留孤忠。



两公并是杀身成仁者，传间尸解亦凿空。
我来此地拜祠宇，入门英烈横高穹。
钟灵孕杰傍沔水，千秋兄弟俎豆同。
仪观犹见唐冠佩，幽沉椁槨回悲风。
贤令如古征诗句，吮毫怅望思遗踪。
丰碑大书秦与米，要与睢阳庙祀俱无穷。

题双忠祠

[兵部尚书]张鹏翮（遂宁人）

成仁取义死犹生，千古双忠弟与兄；
忠孝神仙无二理，人间天上自成名。

由于“双忠祠”位于费县城沔河东岸，加之祠前《唐鲁郡颜文忠公新庙记》碑，阳面碑文由左承议郎、尚书职方员外郎、文名震于朝野的曹辅撰文，明州定海县主簿，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秦观书丹，左宣德郎、知开封府雍丘县同签书兵马司公事邓朏篆书碑额，襄阳漫仕、著名书画家米芾撰写碑阴，佳章妙书，荟萃一石，实属山左名碑，千古绝品。因此，该祠春秋两季祀典兴隆，士民游客观瞻不绝。各地官员过往文者下轿，武者下马，瞻仰之余，吟诗作赋，尊仰乡贤忠烈，珍视名家碑刻（祠与碑毁于“文革”，1997年县政府又将该碑复刻重立）。

在临沂城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建并定名“五贤祠”中，就有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二人（其他三人为王祥、王览、诸葛亮），乾隆皇帝为“琅琊五贤祠”题写的四句御诗第二句为“忠以捐躯颜杲真”，这是对颜杲卿、颜真卿两位“忠冠古今”的忠烈典范的高度评价和褒扬。

颜杲卿秉承了颜氏家族的家教、家学、家风，继承了颜氏家族文化的真谛，在国家有难出现分裂时，毅然高举义旗，勇赴国难，义无反顾，虽死不悔，为后世谱写出如此壮烈的诗篇，成为中华民族历代英烈的典范。其壮烈殉国的光辉形象和表现出的爱国思想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力量，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齐鲁风俗民情

中国年鉴

齐鲁文化是东夷土著文化、殷商文化和周族农业文化融合的结果，齐鲁文化的真正存在价值和真实生命力在于齐鲁风俗之中，通过风俗民情来把握齐鲁两国的文化精神，来得更加直观，更加准确。

齐鲁立国之前，远古时代的山东先民被称做“东夷”。那时候，华夷界限并不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中原先民也没有后来那么浓重的优越感和文化中心意识。考古发现的不同类型文化说明，那时呈现文化中心多元化的格局。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东夷文化一直居领先地位。中国的龙、凤文化就是东夷太昊、少昊最早创造的图腾意识，而黄帝的“云”，炎帝的“火”，共工氏的“水”等，却不被后人认同，没怎么成气候。春秋时期的郟国（今山东郟城北）就是少昊的后裔。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郟国国君郟子到鲁国朝见，叔孙昭子请教说：“少昊氏以鸟名官（命名各级官长），是怎么回事？”郟子追溯说：“黄帝用‘云’记事，以云名官；炎帝用‘火’记事，以火名官；共工用‘水’记事，以水名官；太昊氏用‘龙’记事，以龙名官。我高祖少昊摯即位时，凤鸟适至，故以鸟名官。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等，都是掌管历法的官。祝鸠氏是司徒，鵙鸠氏是司马，鹁鸠氏是司空，爽鸠氏是司寇，鹑鸠氏是司事，这五鸠是鸠集治民的官。五雉是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他们的职责是改善工具器物，统一尺度容量，以维护百姓的公平。九扈是九种农官，管理百姓好好生产，制止歪门邪道。自颛顼以来，远古的这些历史失去记载，命名官吏也以实际管理的事情来命名，不再按照远古的惯例办理了。”

郟子以无限的自豪感，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先祖这段远古职官史，把鲁昭公、叔孙昭子讲得心往神追，沉醉在远古文化殿堂中好半天。以通悉三代因



后羿射日

革损益而自诩的孔子听说后，也被其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拜倒在郯子门下，并发出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感叹。

除龙、凤等鸟图腾外，东夷人好猎善射，还是弓箭的发明者。《山海经·海内经》称：“少昊生般，始为弓矢。”《说文·矢部》称：“古者夷牟初作矢。”夷牟当为牟夷，是东夷族的一支。从字形上看，“夷”字由“大”和“弓”组成。据考古发现，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的男性平均身高为172.2厘米，有的高达190厘米，而西夏侯新石器时代的男性身高为171.3厘米，西安半坡遗址中的男性平均身高则还要矮。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大人国，即指东夷人，多勇力，善射，是其共同特征。后来人们所说的“山东大汉”，并非虚谬，而是有历史根据的。说到善射，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羿和他的妻子嫦娥还留下了一段美丽而浪漫的传说。

相传东夷有穷氏的首领羿本是天上的神射手，和妻子嫦娥在仙界过着幸福的生活。天帝帝俊有十个太阳儿子，轮流执勤照耀人间。可后来，这十个儿子突然不守规矩，一齐出来了。结果，天上十日并出，庄稼草木被烧焦了，人民饥灼交迫。当时，地上统治万民的尧率领百姓乞求太阳们为了天下的生灵而守守规矩，可一点用也没有。眼看着天下苍生即将被烧得消亡了，天上的帝俊终于下了狠心，给了神射手羿弓箭，要他到人间向天上射箭惩罚他的十个太阳儿子。

羿带着妻子嫦娥从天上到了人间，看到人间惨状，悲愤无比，执行惩罚的时候大开杀戒，连续射杀了九个太阳儿子，只留下最后一个太阳，因为人间需要光明和温暖。羿为人民立了大功，却大大得罪了天上的帝俊，不能回到天上，成了人间英雄。

洛水之神宓妃是伏羲的女儿，丈夫河伯跟民间巫婆勾结，强娶年轻姑娘当媳妇。有一次，羿和宓妃邂逅相识，双双堕入爱河而不能自拔。河伯得知大怒，寻找羿决斗，他哪是英勇神武的羿的对手，被射瞎了一只眼睛。河伯将伤眼、夺妻之事告到天庭，帝俊正好借机公报私仇，要将羿押往肢离山处以肢离之刑。宓妃既与羿情深义重，又痛悔自己感情不专。于是，她向帝俊求情，答应断绝和羿的爱情，不再踏出洛水一步。羿得救了，而河伯那个死亡家庭也恢复了。

做了一回堕落天使的羿，又回到嫦娥身边。嫦娥本来就对不能重返天界不满，又抓住了丈夫婚外恋的把柄，喋喋不休地唠叨、埋怨。羿也觉得愧对妻子，既然不能回到天界，至少要在人间长生不老啊！便从西王母那里索取了两颗长生不老之药，想以此作为对嫦娥的补偿。嫦娥得知，趁羿外出时把药偷吃了个精光。一会儿，嫦娥就觉得身体发轻，不由自主地向天上的月宫飞去。原来，西王母的药，吃一颗就能长生，吃两颗就可升天。从此，嫦娥失去了家庭和丈夫，孤身一人在冷清的月宫里受着孤独和黑暗的折磨。羿日夜思念嫦娥，不久忧郁孤独而死。有的说，这是上天对嫦娥不忠于丈夫的惩罚。还有的说，嫦娥到月宫变成了蟾蜍，是罪有应得。天上无情，人间有义。民间风俗却把嫦娥当成是美丽、善良的化身。每到中秋节，都把全家团圆的安慰遥寄给月宫的嫦娥，希望他们夫妻美满团聚。

羿死后，其子孙被称做后羿，世代为帝司射，以勇武善射而闻名天下。夏王太康淫逸、放纵，兄弟五人发生“五子”争夺王位的内讧，后羿乘机夺取了夏朝的统治权力。夺取夏政后，后羿又步太康的后尘，射猎无度，不理政事。他的亲信寒浞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收买后羿的左右，杀死后羿及其家属，篡夺了统治权。

通过这些古老传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东夷族的生产力水平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当先进，帝俊、尧办不到的，东夷族的羿却能办到。

其二，东夷族世代以狩猎为业，以强大的军事武力威震天下各部落。

其三，从羿与洛水之神的婚外恋以及嫦娥偷吃仙药的故事来看，东夷族在两性关

系上比较自由、浪漫，妇女的地位较高，且不受家庭伦理观念的束缚。

其四，东夷人有着丰富的思维想象力，远古人类奔往月球的最初遐想，开始于东夷人。

其五，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览冥训》，记载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东汉张衡的《灵宪》说，嫦娥奔月后变为蟾蜍。有关羿和嫦娥的传说，成为中秋节风俗的主要渊源，反映了古人对东夷文化的认同。

此外，东夷人喜欢饮酒歌舞。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高柄杯，是典型的饮酒器物，真实地反映了远古东夷人好饮酒的生活特点。《后汉书·东夷传》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197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了一件笛柄杯。据说音响清脆悦耳，能吹奏出四个音阶，与现代横笛不贴笛膜时的声音相似，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横吹陶制管乐器。舜的韶乐就是东夷音乐，孔子赞赏它尽善尽美。春秋时期的莱夷（在今山东半岛），乐舞仍非常发达。齐国灭掉莱夷，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莱乐。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与鲁定公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南），安排莱人奏莱乐，想借机劫持鲁定公，结果被孔子识破。由此可知，那时的莱乐不仅有音乐，而且应该和武舞结合在一起。不然，劫持鲁定公的计划很难实现。

夏商建立，只是对各部落、方国的臣服，东夷仍为各地的次文化中心之一。商族是鸟图腾，其文化渊源本身就是东夷，所以才具备那么高的文明程度。周灭商，既是西夷文化的东渐，也是西方落后部族灭掉了东方先进部族，所以显得特别心虚和不自信。正是这种自卑感和紧迫感，刺激了西周各种典章制度的高度完善。西周初年为维护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是史无前例的，它一改夏商对诸部落、方国的臣服政策，把自己的宗族成员派到各地实行直接统治，把势力所及的部落文化逐步同化到中原文化中来。于是，东夷太昊、少昊、舜，也包括羿、商在内的部落文化，都成为华夏文化昔日的辉煌，为人们所共同尊奉。孟子曾讲，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尺度、准则）一也”。在以姬姓周族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崛起后，加之数百年的“四夷宾服”，原来的心虚和自卑逐渐转化为日益强烈的自信和优越感，从周天子到姬姓为主的各诸侯国，开始以诗书、礼乐、法度等华夏文化中心相标榜，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鄙视、排斥曾和它们同处在周边的四夷了。季文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论调，就是证明。

由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就反映了这一过程。齐国立国时，对东夷的风俗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因其俗，简其礼”的措施。对这种基本国策，后来齐国的统治者奉行不替。管仲相齐，仍采取“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政策。齐国“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有得天独厚的發展工商渔盐的自然优势。姜太公有识于此，立国之初就确立了适合齐国特殊人文、地理环境的立国方针。政治上“尊贤而尚功”，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经济上“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实行农、工、商、渔、盐并举的多元化体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泱泱大国，因而也成为工商业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国度。人们的经世观念、人格追求、道德选择等种种社会风尚，都受到商品经济意识的浸润，表现出明显的工商业类型的社会风尚。

其一，追逐富利和夸富羞贫的社会氛围。

如果说“尊尊而亲亲”是宗法社会的风尚的话，那么拜金主义、夸富羞贫就是工商业社会的风尚。富既可满足物欲，又能得到地位和尊严。于是乎，富与利成为齐国社会的共同语言，金钱成为人们追逐的共同目标，以商人为领头羊掀起了一股

“奔富厚”的狂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商贾相聚，“相语以利，相示以赖（赢），相陈以知贾”。人们为了发财致富，努力实践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信条。正像《管子·禁藏》所记载的那样：“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在“甚富而实”“多文采布帛”的经济背景下，齐国逐渐形成一种“喜奢忘俭”的奢侈之风。这种风气从齐桓公、管仲时代就开始了。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齐国名相管仲“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娶三姓之妇，富拟公室。尽管孔子坚持称赞管仲“仁”，却也几度斥责他不知“礼”和不“俭”，甚至认为他“以侈逼上”。按照礼制规定，“君子不履丝屨”。齐景公为履，用黄金做鞋带，饰以银，连以珠。到了战国，高消费的奢华之风越来越升级。尤其是齐国国都临淄，成为贵族官僚、富商鸿贾满足物欲的销金窟。孟尝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以高额的消费豢养着数千食客。他有一狐白裘，价值千金。邹忌整天对着镜子，和城北徐公比美。崇奢恶俭之风，也吊高了一般市民的消费胃口。临淄市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孟子·离娄下》记载，有个齐国人，每天都在外边吃得酒足饭饱，对妻妾吹嘘和富贵人在一起吃喝。妻子偷偷跟踪察看，原来是到坟墓间向祭墓者乞讨剩余的酒肉。这个故事，形象地反映了齐人对高消费生活的虚荣心。

其二，等价交换的价值取向和重功利、轻伦理、缺乏人情味的特质。

适应商品经济需要，货币也发达起来。齐国的刀币无论种类、数量都首屈一指。共有莒谭邦之法化、齐建邦之法化、即墨之法化、即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法化七种。“法化”即标准货币。就是这些“钱”和等价交换意识，如同决堤的洪水，冲淡、淹没了齐国本已淡薄的宗法伦理观念以及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主仆关系和人情世故，代之而起的是重视现实利益，互尊、互利、互惠的等价交换意识。齐国人际关系越来越呈现出重功利、轻伦理、缺乏人情味的特质。

据《商君书·徠民》记载，有个叫东郭敞的齐人，准备蓄资万金买爵。其弟子请求借贷，分文不给，师徒反目成仇。既然老师不爱学生，学生当然也不爱戴老师。

《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戎夷和弟子离开齐国来到鲁国，城门已关，师徒二人寒夜宿于城门外。夜愈深，寒愈甚。戎夷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我活；我把衣服给你，你活。我是国士，为了天下不能死；你是不肖者，命不值钱，把你的衣服脱给我！”弟子见老师如此无视自己的存在，非常反感，反唇相讥说：“既然我是不肖者，又怎么能有那么高尚的献身精神，把衣服脱给国士呢？”

赤裸裸的等价交换和市场上讨价还价、互不相让的现象，使人们越来越看到人际关系的实质，对旧秩序的义务感和旧道德的尊崇逐渐淡化，浸润到人际关系中，又转换成道德上的等价交换意识。战国孟尝君以善待食客而闻名天下，一朝遭谗失去相位，三千食客掉头而去；待其恢复相位，又心安理得地重新回来。“夫天下之道以市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食客们把伦理、主仆、人情全都视为商品，纳入等价交换的意识中，丝毫不受这些名分、等级、依附关系的道德约束。在齐国，“富贵多士，贫贱寡友”，成为人际关系的共识。

工商业的等价交换意识，还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念中。孟子先后两次在齐国居住，把这种君臣道德交换关系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孟子·离娄下》载孟子语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让后来专制皇帝不喜欢的地方，因为它带有鲜明的互尊、互惠、等价交换的商业意识。这虽出自孟子之口，

却是齐国的社会风尚。

这种用“物利”取代等级、伦理、人情的做法，难免因缺乏应有的人情味而显得过于冷酷无情，且带有势利小人的卑鄙，却是与农业文化中平均主义、吃伦理道德的大锅饭完全相悖的新观念，是一种鼓励人们不断进取的强力度的文化心态：富贵、强大、勤奋就有地位，有尊严；贫贱、衰弱、懒惰不仅要失去尊严、地位，而且要被淘汰、遗弃。

其三，好智谋、善辩论、多权变的个性。

经商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它不仅要求工商业者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魄，还要有足智多谋、变诈难知的高智商。《汉书·地理志》称，齐人“舒緩阔达而足智”，“言与行谬，虚诈不情”。《韩非子·外储说上》记载，齐宣王喜欢听竽，让300人一块吹，对竽一窍不通的南郭处士也滥竽充数而混吃混喝。齐宣王死，齐湣王立，喜欢一个一个地听，南郭处士只好逃走了。这个滥竽充数的故事，似乎说明齐人的变诈是道德低劣，好坑骗欺诈，钻制度的空子，其实不然。海岱间多智谋、好变诈的特性，不仅塑造出邹忌、淳于髡、鲁仲连等善于隐言讽谏的智辩之士，而且孕育出司马穰苴、孙武、孙臆、田单等一大批善于“诡道”，讲求兵不厌诈的军事家。

齐国智辩之士往往把进谏的内容隐寓于谈笑诙谐的机辩中，既切中要害，又不伤统治者的脸面，也保护了自己。战国齐威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臣下谁也不敢进谏。淳于髡隐言讽谏，问齐威王说：“国中有大鸟，停在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大王知道此鸟叫什么吗？”淳于髡既指出齐威王不理政事的消沉行为，又维护了他的自尊，巧妙地唤醒了齐威王奋起振作的雄心，幡然醒悟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来，齐威王果然一鸣惊人，励精图治，威行天下36年。其他像邹忌以鼓琴的节奏，向齐威王说明“治国家而弭民人”的道理；以自己的妻妾和客人恭维自己比城北徐公美的事例，隐喻上下欺蒙的昏暗政治。后来中国传统道德往往认同忠厚可靠、恪守信义，而不赞成这种“花言巧语”。其实，面对当政者肆虐而又拒谏，一个憨厚、老实的直肠子，只能束手无策，充其量只能鲁莽直谏，于事无补地丢掉性命。只有具备多智善辩的高超进谏艺术，才能扭转事态的发展方向。

至于司马穰苴、孙武、孙臆、田单等齐国兵家的足智多谋，更是令人叫绝和富有传奇色彩。尤其是孙臆，尽管命运坎坷不幸，但凭借着自己超人的智慧和顽强的生存能力，仍然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业绩，在那个强力抗争的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残疾人的自强、自立以及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孙臆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齐人的这一风尚鲜明地反映了工商业文化对高智商的要求，它是一种适应社会、搏击生活、奋发向上的强力度文化心态。

与海洋型、工商型的齐国相反，鲁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农业型的国家。鲁国处在泰山之阳，洙水和泗水之间，地势平坦，宜于农业、畜牧业、蚕桑业的发展。建国之初，周公就确立了“尊尊而亲亲”的用人方针。周公长子伯禽到曲阜后，“变其俗，革其礼”，强制推行周族单一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周人的风俗文化。鲁国是典型的农业宗法社会。

其一，好礼仪、尊传统的正统性格。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鲁人“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鲁人对“先君周公创制”，充满无限的崇拜感和自豪感，言必称“先王之训”，事必遵“先王之业”。

鲁大夫公父文伯（公父，季悼子之孙）之母敬姜，被公认为是遵守礼仪的楷模。她是季康子的从叔祖母，奶奶和小孙孙在一起还避什么“嫌”？可季康子去拜见她，

一个在屋内，一个在屋外，不逾越门槛。公父文伯死，为了不使儿子沾染好色而死的名声，要求儿媳们不准毁哀过度。丈夫和儿子死了，她按照“寡妇不夜哭”的礼制，朝哭丈夫，夕哭儿子，日程安排得分毫不差。孔子在生活小节上也严格讲究礼仪。《论衡·自纪篇》载，鲁哀公赐桃和黍给他，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谓得食序矣”。也就是说，吃东西都要分先后次序。《国语·鲁语下》有一大段敬姜教育儿子的话，其中不厌其烦地提到“昔先王”“古之制”“先王之训”“先人之业”“必无废先人”等等，反映了这位老太太对先王典礼、对传统强烈的认同和归属。

对传统的崇拜和义务感，塑造了鲁人自信与忠诚、保守与内敛的正统性格。曹刿折傲卿相，以“肉食者鄙”的气度与鲁庄公“平等对话”；孔子、七十子之徒均有为王者师的人格风范；子路“衣敝组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表现了蔑视一切的自信；子贡“连驷结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对正统性格的固守，又演化为鲁人持重保守，惮于革新的个性和囿于传统的负累。孔子对恢复周礼，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却没有齐人“多权变”的灵活。子路遵守贵族礼仪，更是迂腐得可气。卫国发生内乱，他在激战中被砍断了冠缨，说：“君子死，冠不免。”竟然放下武器去结缨，结果被人杀死。然而，他又表现了一种至死不乱方寸的牺牲精神，成为后来烈士们整好衣冠，从容就义的精神渊源。

其二，尚经典，尊学术，重视礼乐文化素质的提高。

周初大分封，鲁国得到的文物典籍最多。鲁国人对这些文物典籍格外珍惜，备加爱护。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鲁国公宫失火，南宫敬叔赶到，首先命令周人抢出“御书”，好好保管，说：“如有损失，处死你！”子服景伯随后赶来，命令宰人抢出“礼书”保管，说：“如果失职，按律严惩！”季桓子来了，命令藏好教令档案，说：“旧章不可亡也！”在毁灭一切的烈火面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珍宝、财物，而是典籍，可见文物典籍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春秋时期，鲁国是全国的礼乐文化中心。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国韩宣子使鲁，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后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

齐人“好声色狗马”，鲁人好讲习礼乐。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鲁国“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要求人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孟僖子陪鲁君朝楚，对自己不通礼仪而一再出丑十分痛心，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返鲁后，“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临去世，高度赞扬孔子，嘱咐两个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学习礼仪。周大夫原伯鲁曾说：“可以无学，无学不害。”鲁人对他深恶痛绝，说：“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在鲁国人看来，学习好像种庄稼，不学就会枝叶枯萎、坠落。说到学习，孔子是最值得称道的典范。他那些“敏而好学”之类的格言人人皆知，在齐国学习韶乐，达到忘我的境界，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晚年喜欢学《易经》，其手不释卷，韦编三绝的故事，传为刻苦攻读的佳话。孔子创立私学并非偶然，鲁人对学习礼乐文化的向往和痴迷，是其深厚的文化土壤。

此后，鲁人的这一风尚经久不替。《汉书·儒林传》载，刘邦消灭项羽，“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由此可知，古代耕读传家的传统，山东人崇圣重教的风尚，汉代邹县一带“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宋代“十万人家尽读书”，近代山东乞丐、土匪兴学的病态现象，以及现代山东高考分数居高不下，均发端于春秋时期的鲁国。

其三，择瘠处贫，自给自足，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

齐人崇尚高消费，夸富羞贫；鲁人择瘠处贫，勤俭持家。鲁国无渔盐之利，商品经济不发达。统治者似乎缺少发展工商、富国裕民的政策和自觉意识。鲁大夫臧喜

伯曾劝谏鲁隐公说：“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也就是说，国君要抓大事，山林川泽的收入，下层人民的用度，不要多操心，颇有点限制国君插手经济建设的味道。由于货币的需求量不大，鲁国也不太注重货币的铸造。鲁国很早就以贝朋做货币，在鲁国故城发现了许多海贝、石贝、骨贝，只是在春秋晚期的墓葬里才发现铜贝，但到目前为止没发现铜币。而战国时期小小的莒国也铸有刀币。

鲁人是典型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农民意识。敬姜教育儿子说：“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土地肥沃，生活安逸，孳生不成才的膏粱子弟；贫瘠的土地可养成崇尚仁义、热爱劳动的品格。所以“圣王之处民也，择瘠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常王天下”。而自庶人以下应该“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也就是说要日出而作，日暮而息。鲁国是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型的自然经济。敬姜身为贵族夫人，仍坚持纺织。鲁相公仪休之妻出于职业癖好而纺织不辍，公仪休为不与民争利而怒焚其机。曾参之母听到儿子杀人仍不下织机。杜甫称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近代山东妇女“精耕耨，巧纺织，善栽种，勤牧养”，应该是来自鲁国妇女的优良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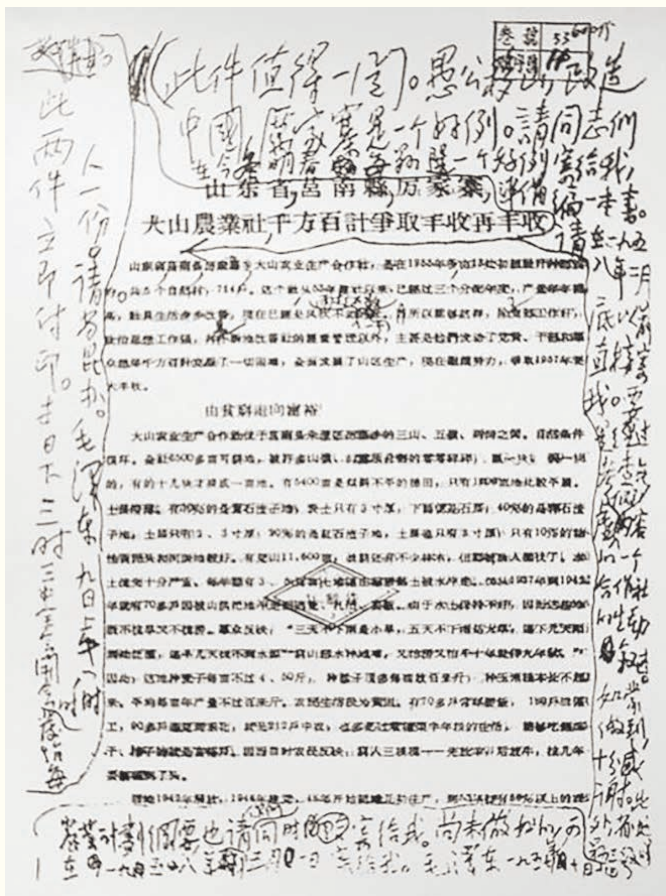
鲁人不仅勤劳，而且节俭持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鲁国“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灾，民好蓄藏”。该篇多处提到，鲁人“俭嗇”，“鲁人俗俭嗇”。《国语·鲁语下》中也说：“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与齐国夸富羞贫的风气相反，鲁国是不羞贫贱。孔门弟子子路，“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颜渊，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饮；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是中国第一批穷学生。

早期的鲁人与工商无缘，司马迁讲的“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是说及其国力下降，传统观念动摇的时候，商贾之风才兴盛起来。子贡从卫国辞官经商，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但是，鲁人长期养成的农民意识和农业生活方式却根深蒂固。《史记·货殖列传》载，有个叫曹邴氏的鲁人，靠冶铁而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腰缠万贯仍然省吃俭用，抬头想天上掉下点什么，低头想捡点什么，这决不是一个工业家的消费方式，而是鲁国农业社会孕育出的，中国第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对齐、鲁两种文化类型曾做过十分深刻、准确的概括：“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朱熹在该篇的集注中解释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朱熹接着说：“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也就是说，齐国风俗是工商业的，动态的，开放的，沿海文化类型；鲁国风俗是一种农业的，静态的，封闭的，大陆文化类型。

忆师哲视察厉家寨

王滨



毛泽东对厉家寨的批示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主席的批示，是厉家寨人前进的动力。今日，新愚公继续挖山不止，再谱新篇章。我们作为当年在当地工作的人员，不禁追忆起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师哲视察厉家寨的往事。

省委书记来了

1957年，在麦收前后的一些日子里，久旱不雨，农作物旱得枯萎了叶子，农民万分焦急。一天，突然高空中冷热空气交锋，小雨、中雨和大雨交替下着，这雨一下就是三天三夜，甘雨滋润着禾苗，农民欢天喜地，雀跃不已。

这年6月22日上午10时，窗外麻杆子雨，大一阵小一阵地下个不停。室内，莒南县委书记杨雷，正在根据中央八大关于“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向地球开战”的指示精神，思考着大力推广厉家寨大山农业合作社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问题。一辆乳白色的吉普车在雨幕里驶进莒南县委院内，从车上跳下一位陌生的长者，5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身材，文雅慈祥，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杨雷冒雨上前迎接。

这位长者抢先做了自我介绍：“我叫师哲。”“噢，您就是山东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我听说您曾经给毛主席做过翻译。”杨雷也做了自我介绍。

“咱们去厉家寨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看看好吗？”

“好，请书记稍休息一下，雨停了再去吧！”

师哲沉思了片刻，说：“谁知雨何时停，这就走吧！”

杨雷跳上车，陪同师哲前往，吉普车消失在雨幕中。

路上，杨雷向师哲汇报了全县生产建设情况，当提到县委多年来大力推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进行山区生产建设的经验时，师哲同志兴致勃勃地一再询问有关细节。

车子颠簸了约半个小时，来到厉家寨。杨雷急匆匆下车，冒着大雨将厉家寨乡总支书记厉月坤叫来，介绍给师哲。师哲抢先开口：“我是第一次来参观学习。”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接着说：“现在雨又下大了，请你先介绍您社的情况好吗？”

厉月坤说，俺厉家寨解放前条件很坏，共有6600亩可耕地，被许多山路、河沟分割得零零碎碎，瓢一块，碗一块的，有的十几块才凑成一亩地。有5500亩地是倾斜不平的坡地，多是黄石渣子、青石渣子，土层只有二三寸厚，比较平展的土地只有1100亩。从前还有不少树木，但是被人滥伐了，水土保持不住，这些土地既不抗旱，又不抗涝。群众说：“三天不下雨小旱，五天不下雨大旱，连下几天雨到处泛滥，连旱几天找不到水源。”“穷山恶水种地难，又怕涝来又怕旱，十年就得九年歉”！因此，一亩麦子产量不过50斤，地里种玉米根本长不起来，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穷人三根棍：先放羊，后放牛，拉几年要饭棍到了头。”

师哲叹息地插话，“现在生产怎么样？”

这时，厉月坤汇报了厉家寨大山农业社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业绩。1942年解放后，厉家寨乡（小乡）五个自然村的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起互助组。1953年冬，成立7处初级社后，全乡农民组织起来，向穷山恶水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首先，从改良耕地开始，深翻地，小块并大块，特别是广大社员创造了“培堤挖沟，深翻整平倒流水”的“三合一”水平梯田，把坡地和沟地变成了良田。开展了闸山沟、修塘坝、打井、修渠、建水库、封山造林等水土保持工作，使3600亩旱田变成了水浇田，涝田得到了整治。由于改造了自然条件，又加上推行了使用良种等科学种田措施，厉家寨大山农业社的生产，迅速地向前发展着，换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年。至1958年冬，13处合成一处高级农业社，叫大山农业社，厉月坤任总支书记，厉月举任社主任，1955年，农业社亩产274.5公斤；1956年，虽然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水灾和风灾，亩产粮食仍然达到了276.4公斤。有90%的社员生活水平赶上或超过了富裕中农水平。

师哲边听边频频点头称赞厉家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他说“山区亩产粮食276.4公斤，是个奇迹，这个壮举，已经提前8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真是了不起呀！”

一捧珍贵的沙土

雨，还在下着，师哲要亲自察看“三合一”梯田，于是我们驱车直奔凤凰岭。这



厉家寨战天斗地

时，乌云突然被后来的白云推到大山西边去了。登上凤凰岭，举目远眺三山五岭，只见游云绕山，擦山而过，我们在飘荡的白云之中，看山，山上的树特别青；看水，水特别秀。11座塘坝水库似明珠一样，嵌在山岭之间，景色分外美丽。

师哲自言自语地说：“百闻不如一见，一看惊人！”他走到花生地里，仔细观察沙土，像找金子一样。然后，双手捧起一捧沙土，让杨雷用崭新的手帕包了起来，托到手里，陷入沉思：这捧沙土是厉家寨人改造自然的丰硕成果；是厉家寨人挖山不止的结晶；是愚公移山、改造自然的缩影。接着他问道：“没整梯田前是什么样？”厉月坤说：“请到那边看看。”便用手扶着师哲，爬到山岭最高处。只见若干块大卧石躺在那里“酣睡”，是一片草都不长的荒地。厉月坤用手指着说：“这就是未整的荒地，群众管它叫‘教育田’。”又说：“脚下东南那条沟，是未整的原始荒沟，你看冲得沟沟壑壑，水土流失极严重，群众叫它‘教育沟’。”

又指着已整的西南方一条沟底川台化的“三合一”水平梯田，与此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师哲略有沉思地说：“厉家寨党支部，是个能团结群众，特别能战斗的党组织。”厉月坤诚恳地说道：“是的，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的好党员，好群众。”

共产党员、社长厉月举是全国劳动模范。他发明了因地制宜整治“熟土在上，生土在下”和“两生夹一熟”改造土质的方法。种花生当年每亩增产花生米25公斤。共产党员、“钢六队”队长厉永谦，带着劈山凿岭，小块并大块，打井浇地，旱田变成水浇田。党员干部就像吸铁石一样，将厉家寨人凝聚在一起。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每个劳动力每年大约要从自己的生产工具上磨掉4两钢铁。这就是厉家寨人的愚公精神。

雨，不紧不慢地下着，我们边看边谈，乘车回到厉家寨大山社办公室。

厉月坤动手生火烧水，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师哲自带的干粮，欢声笑语不时传出窗外。告别时，一捧沙土，便是厉家寨送行的礼物。

后记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莒南县委于1957年4月29日向临沂地委、山东省委和党中央写的《厉家寨乡大山农业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批示：“愚公移山，改造

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毛主席的批示传到厉家寨，大山脚下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在英雄岭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广大干部群众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一致表示：一定继续奋斗，不断创造新成绩，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农民诗人厉守禄高兴地编写了这样一段快板：“毛主席表扬咱移山，咱要更把干劲添。愚公移山代代传，永不骄傲不自满。前段成绩算开头，挖山不止永向前。”

毛主席批示的第4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山农业合作社是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长篇报道，介绍了厉家寨的事迹，并且加了编者按：大山农业社开山劈岭、改造自然，建设山河的壮举，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好榜样。这个英雄合作社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和大无畏精神。”1957年11月3日，《大众日报》以“学习大山社愚公移山改造自然的英雄气魄”的通栏标题，用两个版多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大山社的事迹和经验，并发了社论，号召山东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以大山社为榜样，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自然，掀起农业生产的更大高潮。

这年10月20日，山东省委、省人委组织全省参观团到厉家寨大山社参观学习。中共临沂地委做出向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学习的决定，发出“学大山、赶大山、全区变大山”的号召。

1957年11月中旬，县委按照临沂地委、山东省委的通知，迅速组织了一个以农业局长为组长的模型组，赴厉家寨赶制《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的沙盘模型11块。由我专车送到济南，交给正在省里参加党代会的杨雷送往北京，在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进行了展览。

在省党代会上，师哲与杨雷再次见面，亲切交谈。师哲问：“你还记得我从厉家寨捧走的那捧沙土吗？”杨雷说：“记得，那是今年6月的事。自从带着那捧沙土回来，我逢人就说，见人就宣传厉家寨愚公移山、改造自然的创业精神，也向中央首长作了汇报。”这时，杨雷才领悟出师哲捧走那捧土的重大含义。

杨雷受临沂地委的委托，1957年12月2日，在国务院的第二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重温毛主席10月9日的批示，汇报了厉家寨大山农业社整山治水的经验。陈部长指出：“大山社的同志们，确实是值得我们佩服的英雄，他们的愚公移山精神，……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国务院在这次会议上授予厉家寨农业社一面特制的深红色绒锦旗，旗文是“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

毛主席批示和各级新闻单位报道厉家寨的事迹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8个省、市、自治区，有50多万人次来厉家寨参观学习。不少单位请厉家寨的干部群众传授经验。这不仅推动了厉家寨乃至整个临沂地区整山治水的深入开展，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师哲（1905年—1998年），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人，俄语翻译家。曾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先后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访问前苏联及东欧。师哲还主持过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俄语专修学校和外文出版社的工作。1957年1月，师哲曾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杨雷，曾任中共莒南县委书记，临沂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临沂地委农工部部长，山东省沂沭河洪水东调指挥部指挥。

王凤鸣始末

红 星

二十三团初到山东滨海，团参谋长叶建民与老六团交接防区时，六团团长沙东生、政委吴岱特意嘱咐要注意对付王凤鸣这个阴险狡猾之敌，如果说二十三团调入滨海军区与东北军撤离山东大背景有关，而进入滨海军区则面临一个特殊敌人就是王凤鸣，即已改名杨步仁带领的汉奸部队。王凤鸣是谁？为什么这个红一军团“红小鬼”出身的团级干部，却成为山东八路军的大叛徒？要讲清这一切要从头说起。

王凤鸣，曾叫王洪铭、王宏鸣，福建省长汀市翟田人（也有说是江西人）。14岁时当了苏区儿童团团长，1930年前后参加红军，是标准的“红小鬼”出身，还给罗荣桓当过警卫员。长征北上一次战斗中，他勇猛作战小脚趾被敌人子弹打掉。王凤鸣为人很机警，又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深受领导器重，从战士一级一级升到团级干部。八路军改编时，担任六八五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后提拔为——五师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开国少将肖锋在回忆录里写道：“王凤鸣十九岁（长征结束时），长得很精干，会说有文化，各级领导很爱惜，论关系来讲，我们俩人也处得不错。但他违反纪律，常和女的勾勾搭搭，后来搞得不像话，也没有严格查究，一放再放，总觉得青年干事嘛，有些顾虑。”

王凤鸣随——五师部队东进山东，在创建微山湖西根据地时，刚20岁出头的他，担任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1939年主力部队四处发展，他率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留守微山湖西根据地时，与湖西区委湖边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沆瀣一气，又拉上湖西区委书记白子明，在所谓的“肃托斗争”中，杀害了包括湖西区委主要负责人王文彬、张如、马霄鹏在内干部300多人，造成极其严重的“湖西肃托事件”。王凤鸣、白子明、王须仁通过刑讯逼供追查所谓的“托派”组织成员，再依据炮制“口供”污陷大批军政干部是“托派”，湖西“肃托”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审讯中王凤鸣、白子明、王须仁甚至亲自动手拷问、杀人，最后连苏鲁豫支队副支队兼第四大队队长梁兴初（梁兴祚）都被污为日本特务“揪”出来，上了老虎凳、电刑等残酷刑罚，只差一步就枪毙了。王凤鸣在湖西根据地胡作非为只

能用“疯狂”来形容。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子玉（吴法宪）面对“湖西肃托”事件无能为力，只能报请罗荣桓来处理。幸亏罗荣桓闻讯率部骑马几天几夜赶到湖西，解散了“肃托训练班”，释放了大批无辜干部，才制止了这一极端犯罪行为。对于王凤鸣的所作所为，罗荣桓当场愤怒拍了桌子，撤了他的职。但是从爱护干部出发，罗荣桓认为王凤鸣年轻受王须仁的利用。还是把他带回一一五师师部接受审查，最后只作出降为预备党员处分，最后安排担任老六团团（即六八六团）。1941年2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罪行决定判处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名义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判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执行。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自知罪行太重，1941年8月一天深夜，王凤鸣从一一五师机关驻地赣榆县朱范村潜逃，一口气跑到了80里外的日伪大本营赣榆县城，投降日寇当了可耻汉奸。后被转到新浦，通过青帮道德会（为日宪兵队利用）副会长马干卿，与海州宪兵队新浦分队长立花健治接上了关系。王凤鸣因其舅舅姓杨，遂改名叫杨步仁，被日军任命为海州宪兵分队的别动队司令，要他自己招兵，纠合了5个大队1200多人。死心塌地当上这个“皇协军别动队”司令，驻地赣榆县董马庄。杨步仁当上可耻汉奸后，吃喝嫖赌无一不沾，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是吃香的、喝辣的，金钱如流水，漂亮的女人围着转。”更卑鄙的是：他用这些勾当对一一五师及老六团官兵引诱拉拢，先后被他拉过去团营以下干部好几个，像一一五师政治部协理员（团级干部）投靠他，当上别动队大队长，也成为投敌败类。杨步仁洋洋得意声称要“不战而屈八路之兵”。气得罗荣桓吃不下饭，发誓坚决铲除这个叛徒。

滨海区根据地的东南端有个海陵县，是抗战时我党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创建的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海陵县南临陇海铁路，东接海州附近敌占区，西依马陵山，是连接华中、山东两大根据地的纽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伪一直企图攻占控制。1942年8至9月间，在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过程中，重点对中共建立不久的海陵县采取了“蚕食”战术，今天占一地，明天夺一城，像蚕吃桑叶一样。大叛徒杨步仁别动队充当了急先锋，他趁我滨海区发起第二次甲子山战役之机，以董马庄为基地，依托新浦、牛山车站日军为靠山，疯狂北犯，一步一步侵占上村、丰墩、茴庄湖，再转而西，侵占亭子埠、横沟、罗庄。牛山车站伪军也同时出动进占石榴、东安、房家埠。沙河敌伪也调兵进占小土山、东西小店、狗窝、小庄子。敌人每占一处即修筑工事，建立据点，驻上日军或伪军。两三个月时间竟然在海陵县内安了16个据点。海陵县抗日形势骤变，致使根据地内部分地主士绅以及一些收编土匪动摇，如曾任海陵县参议长的赵霞轩，曾任五十七军独立旅（东北军一一二师起义部队，旅长刘杰，后编为海陵独立团，三三九团前身）副团长的李振东叛变投敌，海陵县原有八个区仅剩下一个羽西区和半个末山区。杨步仁步步蚕食造成我军一时陷入困境。只能在东西只有15公里、南北不到25公里小范围内活动，有一个连在一个月内转移34次。给养粮草也十分困难，八路军官兵吃的是“糝子煎饼就胡盐”，整的大家解大便不下；穿的是“粗布军衣露着肩”，已入深秋“寒衣冰冷似铁”。杨步仁在“蚕食”我根据地最为积极，所部兵锋向北直到大兴镇和欢墩埠，距一一五师师部驻地蛟龙湾、朱范只有一二十里，对滨海根据地南部构成严重威胁。罗荣桓对这个叛徒恨之入骨，亲自布置了海陵反“蚕食”战役。采用“翻边战术”，要求教二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将铁路以北据点一一拔除，要求部队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特别要求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率部狠狠打击杨步仁、罗保成这一类“癞皮狗”。参战的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在旅长曾国华和政委

符竹庭的组织下，战前对“翻边战术”进行深入领会和研究。

1942年11月3日，八路军教导二旅第四团第三营、第六团一部展开反击。配合行动有新一一一师万毅六六二团、第五十七军独立旅以及海陵县地方武装。11月3日，教导二旅第四团（后发展为三三七团）、第五十七军独立旅第一团第二营和海陵县地方武装利用夜色掩护，出动重兵团团包围罗庄据点。罗庄是恶绅李太常的老巢，其子李振东、李春生从独立旅叛逃后，勾结伪军大队长尹玉琢在罗庄安设据点，助纣为虐为害乡里。教二旅四团等部先开展政治攻势，对据点进行喊话，敦促李氏父子投降。但叛徒李振东十分嚣张，竟然反向叫嚣挑战，指战员怒火满腔开始强攻。教二旅四团合同五十七军独立旅第2营以爆破组用土炮、炸药强爆罗庄围壕、碉堡和炮楼，突击队跨壕沟翻围墙冲进据点。从下午5时起，经7个小时激战，罗庄据点被攻克，李振东被俘，伪大队长尹玉琢以下伪军60余人缴械投降。首战告捷，士气大振。5日晚，又攻克圈沟据点全歼伪军80余人。就这样五天连续端了敌人16个据点，把杨步仁别动队的1200余人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200多人。当追击部队围攻杨步仁老巢董马庄据点时，白塔埠伪军200余人前来增援，被教导二旅第四团第三营击溃。青口、新浦之敌伪千余人附九二步兵炮2门，再向董马庄增援，教导2旅等部结束战斗转移，反“蚕食”胜利结束。山东《大众日报》于1942年11月15日专门发表题为《庆祝滨海区我军反“蚕食”大捷》的短评。之后参加反蚕食的教导二旅、五十七军独立旅及海陵县政府、群众团体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和公审大会，会上枪毙了叛徒罗保成等人。

在1946年编辑出版的《滨海八年》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海陵反蚕食”，叫《秋风落叶扫海陵》，语句生动形象，反映了当时的过程：初寒的夜里，各路兵马向罗庄、横沟挺进。枪炮声遥相呼应，火光冲破了黑暗的天边，在震惊魂魄的爆破里，罗庄百余伪军俯首就擒。经过一天战斗横沟克复，一百多个蓬首垢面的伪军做了我们的俘虏，钻狗洞逃出的伪大队长罗保成也被群众抓了回来；声威所播，亭子埠的敌人立即望风逃窜。敌人还没喘过气来，他们又飞快地包围了韩湖。一夜的宣传战把他们的反动思想摧毁了，天刚亮时，我军优秀的炮手开始发射了，第三发炮弹，正打进碉堡，在伪副中队长的脑袋上开了花。160多个伪军，举起了他们的枪，泉沟的百余伪军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杨司令”（杨步仁）再也不敢固守了，放弃了漂亮舒适的司令部，烧了五百匹布，丢了两箱纸烟和抢来的百余只鸡，开始了总的退却。滨海军区反攻部队逼近陇海路。“新浦宪兵别动队”司令杨步仁，遭遇最大的“不幸”：五天内损失了16个据点，600多喽啰，400多支枪，皮鞋、洋刀、汽车、姨太太，就连司令的称呼，一切都随之消逝了”。杨步仁恼羞成怒，将失败原因归罪于他的副司令李良华无能，开枪将其击毙（有称李良华被杨步仁刀劈）。只剩下残兵败将龟缩董马庄死守待援，最后败逃。滨海区反“蚕食”取得了胜利，解放了海陵县超过一半土地，只可惜此役没有击毙活捉杨步仁，让他逃跑了。第二年，杨步仁带着残部在日军安排下，编入盘踞赣榆城的汪伪“和平建国军”独立七十一旅，旅长李亚藩（原东北军五十七军副官长），杨步仁被任命为一四一团第二营营长，驻守赣榆海头一带，继续充当日伪鹰犬。

我说二十三团北上山东主要因为东北军撤出有关，但接防老六团防区后，王凤鸣这个大叛徒就成了二十三团和老六团共同的死对头。有人要问了：为什么接防的是老六团防区？是上级要把老六团与王凤鸣调开吗？历史事实证明，多次打击杨步仁所部战斗都有老六团参加，这一疑问不攻只破。我研究1943年这一阶段山东抗战形势，当时为争夺东北军撤离山东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滨海区六团三营已调出开辟滨海路北这一片新区。老六团（即六八六团）作为滨海区乃至一一五师第一主力，又承担着全区机动作战任务兵力顿感薄弱，二十三团调来正是充实滨海区路南斗争力

量需要。比二十三团还早，从苏北调回山东归建的教导五旅（原新四军独立旅），当时主要投放到滨海区路北开辟新区。所以概括地说：教五旅（后十三团）是开辟新区，二十三团是巩固老区；不是因王凤鸣二十三团北上山东，是北上山东二十三团遇到王凤鸣。二十三团从入鲁攻克赣榆第一仗，乃至在山东抗战整整两年间，杨步仁纠合这伙伪军果然成为二十三团滨海斗争的特殊敌人。咱们就从1943年11月19日二十三团入鲁第一仗——赣榆攻坚战说起。赣榆位于陇海铁路东段，处于日伪军心脏地区的沿海重要据点，是交通枢纽和特务联络中心。赣榆城防御坚固，有高耸的城墙、深阔的外壕、林立的碉堡和层层铁丝网。城内守敌是伪“和平建国军”独立七十一旅，旅长李亚藩率2个团及保安部队等约2000余人长期盘踞在此，不易强攻。根据这些情况，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符竹庭、政治部主任刘兴元等经过研究，确定了“主攻部队外攻，地下工作内应，共同解决赣榆城”的方案。赣榆城攻坚战，在潜伏内线策应下，经一个昼夜连续作战，相继攻克了赣榆县城及周围兴庄、海头等11处据点，全歼伪第七十一旅、警察局，毙伪保安队长，生俘伪七十一旅旅长李亚藩、伪团长张星三以下官兵1600余人，并击退青口日军的两次增援，缴获轻机枪5挺、长短枪830余支、炮4门、战马30匹、汽车2辆、粮食20余万斤和大批军需物资。八路军仅亡3人，伤37人，打了个漂亮仗。

赣榆之战开打前，杨步仁从一年前的海陵反“蚕食”打击下东山再起，纠合了近1000散兵游勇，在赣榆附近海头设立据点，名义上归属伪“和平建国军”独立七十一旅李亚藩部下，实际是日军海洲宪兵队作后台。他占据的海头，卡在黄海海岸交通线上，严重阻碍了苏北新四军与山东八路军的海上联络线上，特别是威胁到我控制的拓汪港。新四军代军陈毅长多次来电请罗荣桓派部队，早日打掉杨步仁这条“毒蛇”，保障新四军与八路军海上联络线通畅。这是二十三团在新四军时老首长命令，也成为赣榆之战重要任务之一。为攻克赣榆，二十三团团团长胡继成、政委王德贵率一营和六团一、二营共同担任主攻任务，二十三团三营在团参谋长叶建民、三营长翟占奎带领下，在赣榆至青口之间三里庙、五里墟一带阻击增援之敌人，二营作为预备队。11月20日上午攻城部队胜利攻克后，三营也把从青口赶来增援200多日伪军打得死伤过半狼狈逃回。之后六天里，二十三团与兄弟部队一起乘胜追歼，一举攻克包括杨步仁据守的海头、兴庄等14个日伪据点，再次打垮了杨步仁部。但遗憾的是杨步仁从海上再次逃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后他又当上重建的伪“和平建国军”七十一旅代理旅



11月19日晚滨海军区部队隐蔽进入赣榆城东北待机

长。

杨步仁在赣榆日伪阵营中的内情，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兴元在赣榆战役后写的《从胜利的赣榆战役中看出的几个问题》总结中，可以略窥一斑。刘兴元在这篇战后总结中写道：“赣榆战役大捷。两天连续攻克大小据点十一个。消灭伪军两千余。在数量上占全赣榆伪军的三分之二；在质量上摧毁了赣榆伪军的主力。”他分析赣榆之敌内部情况时说：“赣榆的伪军内部是相当复杂的，内部矛盾也极尖锐。敌人就利用这些矛盾，使之相互监督，为其效劳。敌人将杨步仁编到李亚藩部下当营长，而又使杨（就是特务）直属新浦敌宪兵队。事实上则是利用杨步仁监视李逆。”“盐警管税收，而敌人又将海头一带交杨步仁管理，不让盐警收税。伪盐警第六大队大队长牛世金与杨步仁争收盐税引起火并，打了两天，结果因杨步仁属敌新浦宪兵队，而将牛逆枪毙。”从中可以看出王凤鸣死心塌地当铁杆汉奸，八路军大叛徒得到日本主人如此青睐。

之后杨步仁一直是二十三团死对头，二十三团打击杨步仁部的战斗不时发生。据团史记载：“1944年秋，我团二营在营长曾玉辉、教导员张子善的率领下，在赣榆县城北大毛耳庄，给叛徒杨步仁部以歼灭性打击，毙敌500余人，俘敌100余人。由于此战行动迅速，执行命令坚决勇猛，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战后，我团二营荣获滨海军区的表彰。”我通过团史查阅到另一次二十三团打击杨步仁部的战斗，时间发生在安东卫战斗之后，1945年5月13日，临沂之敌日军十三旅团和伪军杨步仁部6个连约2000余人，自阿湖车站乘汽车分两路向我进犯，一营、二营负责伏击一路敌人；三营奉命在大小庄一带打援，配合四团伏击另一路进犯之敌。三营打的援敌就是杨步仁部6个连。战斗中三营打得英勇顽强，特别是十连阵地前出，遭敌人反复冲击而巍然不动。陆建当年是二十三团三营十连指导员，他珍藏有战争年代的日记本，因埋藏地下霉烂残缺的存页中记录了当天的战斗经过：“1945年5月17日（星期四），三营昨天在大小庄一带阻击敌人。十连全部与杨逆步仁部六个连展开了反复冲杀，敌死亡营副以下二十四人，俘伪九人，缴枪十余支。我牺牲班长严爱忠以下六人。”从中可以看出，杨步仁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仍然拥有不少于六个连的实力，盘踞在滨海赣榆一带，甘当日本侵略者鹰犬，始终以人民为敌。他能够几次从滨海八路军手中逃脱，也说明他对八路军战法、战术颇为了解，紧要关头总能金蝉脱壳，果然狡猾阴险之极，不可小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日本人的走狗杨步仁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另一个大汉奸郝鹏举拉了他一把，将杨步仁所部收编到郝鹏举新编第六路军麾下。1946年1月9日，郝鹏举屈从于我军政治和军事压力，在台儿庄前线宣布起义，杨步仁慌忙脱离郝鹏举，宣布独立，为此受到蒋介石的褒奖，任命杨步仁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二处直属四支队队长。1947年10月初，杨步仁再次充当反动派的小走卒，他率部自连云港方向，陆路和水路齐头并进杀向赣榆县解放区，迅速攻下了兴海、城关两区沿海村庄。10月7日，解放军滨海一团向杨步仁部发起反击，迅速攻占下口、王东沙等沿海村庄，打死杨步仁部12人、俘虏90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5挺、步枪50余支，杨步仁自下口村从海上逃走。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和国民党屡战屡败，杨步仁自感末日来临。1948年，杨步仁率残部随着国民党军一路向西败退，窜到了山东台儿庄附近，孤军一支被黄伯韬兵团第二十五军缴械收编。至此，杨步仁（王凤鸣）下落不明，有说在淮海战场被我军击毙，也有说是逃匿出大陆不知所终。

背红十字挎包的英雄许忠诚

高雷

抗日战场上最危险的行当莫过于战地救护，卫生兵的光荣在于他们“救死扶伤，摩肩接踵于奔命，不暇于自哀，永不已于旦夕焉。尤其裹伤再战，终于求仁而得仁，成其挥戈反日之壮烈”。

所以许忠诚被山东军区评为一等战斗英雄的消息，刊登在鲁中军区报纸之时，八路军鲁中军区一团六连的同志们都振奋了。

他们异口同声说：“卫生员是应该得到这光荣的。”

许忠诚是鲁中军区一团六连卫生员，八路军山东军区召开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时23岁，个不高，身材匀称，体魄健壮，黑黑的脸膛，永远沉静地摆着一副和蔼可亲的神情，只有偶尔微笑的当儿，才抬起左眉上端那一道刺刀的伤疤，显出英雄的气概，平常人是沉默的，就在受奖的时候，他也是神态自若，只是谦虚地说：“我不死，就得救护同志，因为我是卫生员，这就是我的任务。”

他参加八路后，从1939年底开始做救护工作，忠于职守，身经百战，每一次战斗，他都穿梭于弥漫的战火与血海的前线，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绷带，来回奔跑，每当他那挎包的红十字一出现，人们总觉得安心了许多，便亲热的招呼着：“哦，卫生员在这里哪。”于是挂花的同志也宽慰了，而他更宽慰着受伤者：“不要喊，我来了。”

他帮伤号迅速而正确包扎了伤口，运送到安全地带，安慰着，接着又投入了战斗。钢铁般的意志，春天般的服务热情，这就是了许忠诚。

1942年日军对鲁中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他疟疾发作，转移中跑了不足200米，人就瘫下去了，如此，他仍坚持着参加了东河战斗，敌人追击着，他咬咬牙站起来就跑，他跑得慢，敌人追得快，看看相隔只有二三十米了，敌人拍手大笑起来：“站住了，优待优待的。”他也叫了起来：“你过来，我优待你。”说着，他掏出了手榴弹。敌人愣住了，然后扭头就跑。这时一位新同志，被敌人打伤了腿，倒在了前面，他跑上前去，替他包扎好，架着他走。后面的敌人又打枪，又吆喝，伤员走不动了，他将伤员扛在了肩上，支撑住不断寒战的病体，趑趄趑趄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终将伤员背回了自己的部队。

还有更值得称道的事迹，那是1941年10月底，风霜降临在沂水大地，原野一片初冬的萧杀，顽固派侵入了我大崮山区，在根据地内楔下了钉子，疯狂地蹂躏着那片红色的土地，欺压着朴实勤劳的群众。直接威胁着我军队和政权的生存。

很快，许忠诚他们部队就接到了上级的任务，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顶着寒风，向蒙阴坡里一带进发。路上，许忠诚默记连首长的叮嘱：“保证不丢一个伤号，尽力让伤号少流血。”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诺言：“只要我牺牲不了，一定完成任务。”

夜幕中，穿过层层山峦，23时部队到达了攻击地点，来不及喘口气，歇一身汗。全体扑向了敌人的据点。

枪声响了，越来越大，泼水一般，在许忠诚的耳边，呜呜地叫唤。炮弹、手榴弹打在岩石上，迸闪出无数耀眼的火花，照耀着冲锋的路途。

二排冲上去了，20多个人攀上了围墙，又滚落了下来，又攀了上去，冲进去了十几个人，一排、三排直接跟进。

许忠诚跟随着连队，在离围墙20来米的地方停下来，他环顾四周，发觉这里有一块难得的平地，前面还有一块凸起的石崖，可作掩护，他把这里选择为战地包扎所。然后在炮火中钻进钻出，拖出了一个个伤号。为他们止血、包扎，并不断地安慰说：“不要紧，同志，我保证你安全。”

一连包扎了15名伤号，许忠诚再次冲进战场，就听到有人在喊：“卫生员！卫生员！”他顺着呼声爬了过去，是一名重伤员。围子上的敌人被喊声惊动了，机枪交叉着打了过来，他趴伏在伤员身上，轻轻地叮咛：“同志，这是为革命，是光荣的呀！不要喊……”

枪声稀落了，他打开急救包，为这名重伤员裹好伤，抱着伤号侧身匍匐，忽然，飞过来一枚手榴弹，在他头顶上空爆响，他的头“嗡”的一声，眼前绕起眩晕的金花，耳朵里什么也听不到了。他用绷带将伤号缠在身上，愣愣怔怔将其背了下来。

战斗坚持到天明，他护送着担架一抬一抬往下送，刚出了山峪，晨光中突然发现前后左右都埋伏着敌人，连长带着机枪班去抢左边的山头，不停地喊：“卫生员，快送伤号走！”

他目送着担架离去，自己却没有走。一个机枪射手被敌人打穿了肚子，躺在了半山腰上，他跃起身子，向山上冲去，身边的子弹噗噗作响，打在地上，弹起朵朵土花，他躲闪蹦跳爬到山上，把伤员背到了沟底，止血包扎，不远处的土埂后面，已有敌人在晃动，机枪射手劝导他说：“卫生员，你快撤，不能让敌人捉了去，死活由我自己！”

他没有慌张，冷静地说：“不！咱死死在一块。我活着，就要把你背下去。”他言出必行，在敌人的火力网底下，生生把机枪射手抢了出来，送到了卫生队。

他没有休息，再次返回，背下一个打伤了脖颈的伤号。

远处空旷的麦田中间躺着一个灰色的影子，是我们的同志卧伏在那里。150多米的距离，沿途没有遮蔽物，许忠诚顶着枪林弹雨，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挪动，近前一看，我们的同志已经牺牲了。他牙齿咬得格崩格崩直响，心里说：“同志，不管怎样危险，我一定把你背回去。”

血映残阳，敌人的子弹在许忠诚身前身后追逐，他毫无惧色，背回了同志的遗体。

许忠诚身经百战，救死扶伤，从不懈怠，经他的手解救的战友，无从计数。难能可贵的是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没有武器，全凭赤手空拳。在梁家官庄战斗中，俘虏了三个敌人，缴获了步枪三支，洋马一匹，炮弹一箱。当他的故事成为传奇之时，

1944年的某天，他第一次挂花了。

那是讨伐叛逆吴化文的战斗，石陋住着吴化文的一个师部，周围30里都是吴化文属下的据点，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八路军敢于虎口拔牙，中心开花。

夜深沉，伸手不见五指，许忠诚他们六连像一把尖刀，从60里外的根据地，越过道道封锁线，插进了石陋，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惊慌失措的伪军死的死，伤的伤，剩余的敌人躲进了几个大碉堡苟延残喘，拼死挣扎。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敌人支撑不住了，准备突围。

“不行！”团长命令说：“六连赶快向西南运动，截住那些坏蛋。”

许忠诚跟着二排冲在了前面，一名新战士跑了没几步，趴在了地上，直嚷：“肚子疼。”

许忠诚安慰他说：“趴在地上，一会就好。”然后接过了他的枪，压上三粒子弹，奔向枪声紧急的地方。

敌人的炮火向冲锋的我军急袭，冲上去的一个班，有五六个同志挂了花，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地堰子下面，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许忠诚无所畏惧，同时间赛跑，迎着枪弹奋勇向前，把一个个同志抱着、背着、拖下了水沟，精心包扎。

一个重伤员，流血过多，听到了沟中的流水声，张开干裂的嘴巴，直呼：“喝水！喝水！”一位轻伤员用手捧住溪水，挪动到重伤员跟前，被许忠诚严厉地制止了，他给重伤员打了一针吗啡，为他止痛，一面告诫大家：“负伤喝脏水要出人命的，坚持，坚持住，天黑就来担架了。”

天一黑，果然我们的担架队上来了，许忠诚把每个伤员都抬上了担架，扛着枪，护送他们到后方医院，安置完毕后，再次重返战场。

春寒料峭，天空中下起了丝丝细雨，夜幕中，许忠诚深一脚浅一脚地翻山越岭，虽然汗流浹背，他为能再次参加战斗充满着无限的喜悦。

敌人崩溃了，漫山遍野都是晃动的人影和凄厉地喊叫声。一颗手榴弹在他面前爆炸了，趁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他看清楚30米开外的土埂后面，趴着两个伪军，他举枪瞄准，打了两枪，有一个敌人倒了下去。枪膛里只剩下一粒子弹了，他心里想：

“这粒子弹，留住有大用处。”他只身冲上前去，看明白了残存的敌人正拼命向后爬，他高喝一声：“缴枪！不缴打死你！”

伪军坐在了地上，不断地拍着手，意思是已经缴枪了。

许忠诚平端着枪走过去，看见俘虏面前平躺着一躯黑影，他用脚踢了踢，“是武器”。他弓腰捡起来，不由得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原来是一挺机枪。”

他聚精会神地抚摸着、摆弄着这挺心仪的武器，冷不防，黑暗中窜出一把闪烁着寒光的刺刀，劈在了他的左眉上端，他怀抱的机枪向远处飞去，一个踉跄，人摔在了地上，黑暗中，他看见敌人溜了，而他不久便昏迷过去了。

雨水扫拂着他的身体，扫拂着他的面部，把他从昏睡之中唤醒了过来，他感觉浑身无力，软绵绵的，他嗤笑自己，身为一个卫生员不能替自己包扎伤口，只能静静地躺在这里。

那是什么声音？仿佛是金鸡啼鸣，震动着山谷，是我们的冲锋号！战士的本能使许忠诚摇摇晃晃站了起来，他看着战友们向前冲去。

那是什么？啊！那挺机枪还在。

导沭整沂工程

山东记忆

沂、沭两河分别发源于鲁山和沂山南麓，并行南流于古邳州（今邳县）以西、以东汇入泗河。历史上，沂、沭河就经常泛滥于鲁南、苏北平原。到了近代，更是水患频仍，危害百姓。据调查，1931年、1937年沂河洪水泛滥，郯、苍、邳地区尽成泽国。苍山县（今兰陵县）平地水深1.5米左右，旧邳县城经常堵塞城门，以防洪水入城，有的群众甚至坐在城墙上洗脚。郯城南部有大片土地因洪涝灾害而荒芜，广大群众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要饭，鬻儿卖女者不计其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忙于全民抗战，洪水灾害也没有得到治理。



导沭整沂工程工地

1946年鲁东南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鲁南、苏北严重洪涝灾害非常关切。山东省实业厅水利队与原苏皖边区水利局撤来山东的人员组成水利工作队，开始进行沂、沭河治理的准备工作。1947年编制了导沭工程的初步治理方案。经过多方论证，中共华东中央局认为，只有完成导沭工程，沂、沭、泗、运四河才能彻底根治，多年水灾才能彻底解除。1948年9月，上述方案得以通过，并组成山东省沂沭河流域水利工程队。同年10月，会同济南解放后参加水利工作的80名技术干部共200余人组成3个测量队，对导沭经沙入海工程路线进行地形与河道断面测量。1949年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导沭经沙入海工程全部计划初稿》。同年3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向华东局递交了《关于导沭经沙入海的治水救灾计划的报告》。报告汇报了开展导沭工程的原因以及工程的准备情况，汇报了工程的计划和步骤。4月2日，中央华东局复电，完全同意山东分局导沭经沙入海的治水救灾计划。同年3月成立山东省导沭委员会，鲁中南行署副主任李乐平兼主任，1949年12月增调薛翰亭、江国栋、刘海岩为导沭委员会副主任，张璠任总工程师。1951年3月，改导沭委员会为山东省导沭整沂委员会，由王涛、王卓如先后兼任主任，薛翰亭、江国栋任副主任。导沭委员会、导沭整沂委员会，先期归鲁中南行政专署领导，行署撤销后归属山东省人民委员会领导。

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华东水利部在徐州、上海先后召开沂、沭、汶、运治导会议和沂沭河治导技术委员会会议。会议肯定了山东提出的治沂必先导沭而后泗、运，及沂、沭、泗分治，沂沭河分道入海的治理方针，确定导沭以山东为主江苏为辅，整沂以江苏为主山东为辅，同意导沭工程的整体工程布局及主要设计指标。

导沭工程是在临沭县大官庄劈开沭河左岸的马陵山，将沭河部分洪水泄入沙河，利用沙河排泄入海，即导沭经沙入海工程。山东导沭工程自1949年4月21日开工，经10期施工至1953年11月24日结束。

主要工程包括：开挖新沭河，兴建沭河拦河大坝、溢流堰。原理是在大官庄北沭河上建拦河坝及溢流堰，迫使洪水东调入新沭河，再由新沭河入海。当沭河洪水达4500立方米每秒时，溢流堰下泄1700立方米每秒入老沭河，2800立方米每秒经新沭河入海。拦河坝长1750米，坝顶宽8米，最大坝高10.7米。溢流堰结构形式为欧基式条石堰顶，堰顶宽75米，堰顶至消力池底5.2米。在落成典礼上，命名为人民胜利堰。导沭工程还包括修建穿沭涵洞一座。这是由于原新沭河河北有83平方公里坡水通过牛腿沟排入老沭河，但新沭河的开挖把这部分水流阻在了河北，为使坡水穿过新沭河仍排入老沭河，因此又修建穿沭涵洞一座。穿沭涵洞位于大官庄北，设计流量18立方米每秒，为混凝土底板，石顶涵洞，高1.5米，宽2米，共2孔，于1950年10月27日开工，1952年12月底竣工，投资200万元。除以上外，导沭工程还包括第一次对沭河进行大规模的培堤、护险。从大官庄起，向上游19公里，按20年一遇洪峰4500立方米每秒标准培修左、右两岸堤防，顶宽3—5米。人民胜利堰以下老沭河按3000立方米每秒培堤。国家投资94万元，完成培堤土石方179万立方米。培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由导沭委员会组织实施。

新沭河向东接沙河，开挖新沭河必须开挖14.2公里的引河，其中有8公里穿越马陵山断麓。一期导沭工程主要包括引河段开挖工程和新沭河末端东梁河至小东关段筑堤工程。共调集民工10万人。引河开挖原计划是土方工程，挖至2米左右遇到石方，当时因未准备开石工具，被迫提前于5月21日停工。该期工程共完成土石方58.4万立方米，用工日351.7万个。二期导沭工程于1949年12月1日开工，调集民工3万人，集中开挖引河石方，至1950年1月3日结束。共完成土石方61.3万立方米，用工日90.9万个。第三期导沭工程于1950年3月19日开工，共调集民工6万人，仍集中开挖引河石方工程，于5月21日结束，完成土石方199.7万立方米，用工日351.7万个。第四期导沭

工程于1950年10月22日开工，此期工程是调集民工最多、完成工程量最大的施工高潮期，共调民工19.3万人，集中11万多人开挖马陵山引河石方工程、大官庄以上沭河筑堤及新沭河建筑物工程，工程施工段长100余公里，老沭河拦河坝、穿沭涵洞及部分桥涵开始兴建。为加强技术指导，又调集渤海水利干校、山东农学院水利系测绘班学员近百人参加导沭施工，并由临沂、徐州、新海连等地市招收90名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进行技术培训后充实壮大导沭工程技术力量，从而培养造就了一批水利技术骨干。此期工程于12月28日结束，共完成土石方944万立方米，用工日1012万个。第五期导沭工程从1951年3月25日开工，共调集民工8.1万人。该期工程于同年8月20日结束，共完成土石方447.8万立方米，用工日330.9万个。第六期导沭工程从1951年6月7日开工，调集民工15.8万人，主要包括修筑新老沭河河堤和沭河拦河坝，开挖新沭河，于12月30日结束。共完成土石方637.5万立方米，用工日605.3万个。第七期导沭工程于1952年3月6日开工，至7月23日结束。主要工程包括新老沭河筑堤，临洪河堵坝筑堤，临洪河截弯，乌龙河改道，修筑沭河拦河坝、溢流堰（人民胜利堰）及溢道土方开挖等，共调集民工8.9万人，完成土石方334.2万立方米，用工日276.2万个。第八期导沭工程于1952年11月25日开工，至12月24日结束。该期工程主要是新沭河开挖和筑堤，共调集民工10.1万人，完成土石方185.6万立方米，用工日246.9万个。第九期导沭工程于1953年3月15日开工，至7月23日结束。该期工程主要是开挖新沭河，新、老沭河筑堤等，共调集民工3.2万人，完成土石方203.8万立方米，完成工日135.3万个。1953年11月24日，第十期导沭扫尾工程开工，同年12月7日结束。调集民工200人，开挖新沭河下游截水沟和修建建筑物。

十期工程共调集民工84.4万人次，累计完成土石方3277万立方米，用工日3232万个，占地35953.7亩。

整沂工程于1951年4月开工，经三期施工至1952年7月结束。主要包括疏浚、培堤及护险工程，开挖分沂入沭水道，沂河筑堤、裁湾切滩，开挖中泓河槽等工程。疏浚、培堤、护险工程是整个整沂工程的基础。按沂河临沂附近6000立方米每秒、李家



庄以下3500立方米每秒进行疏浚、培堤，左岸自阎家口至吴道口，右岸自唐沙沟至吴道口，唐沙沟至临青公路共长100公里进行筑堤。开挖武河口行洪道及新墨河七孔桥到小张庄的中泓河槽5.6公里。整堤护险11处3965米。共完成土石方337万立方米，实用工日185万个，实支工资粮409万公斤小米。治理后，李家庄以上行洪能力达8000立方米每秒，李家庄以下达5500立方米每秒。开挖分沂入沭水道是整沂工程的核心。分沂入沭水道是利用新沭河建成后老沭河泄洪量减少的有利条件，分泄沂河洪水。河道自郯城县刘道口村北沂河左岸向东南至临沭县大官庄老沭河，全长19.5公里，于1951年4月开工，至1952年7月结束。当沂河洪水6000立方米每秒时，分洪1000立方米每秒入老沭河。设计河底宽98—206米，口宽106—223米，地面以下挖深2—2.5米，堤距260—410米。同时挖排水沟27.3公里，筑村庄围埝6.3公里，建桥涵10座。完成土方419万立方米，开石0.9万立方米，实用工日300万个，支付工资（小米）593万公斤。当时由于资料不足，计算不准，1953年当临沂洪峰6000立方米每秒时，仅能分洪405立方米每秒，不到设计标准的一半。

整个导沭整沂工程历时5年，先后动员临沂、沂水、泰安、滕县、胶州、徐州6个专区37个县（市）民工114万人次，技术工人4500余人参加施工，共完成土石方4827万立方米（其中石方315万立方米），实用工日4255万个，共筑堤800余公里，挖河85公里，并完成沭河拦河坝、溢流堰、穿沭涵洞等各种建筑物53座，开支经费4500万元（1.5亿公斤小米折价）。工程既艰巨又宏伟壮观。施工中到这里来参观的中外专家，都为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伟大工程而钦佩，对用土车、扁担、铁锹、镐头、铁锨、炸药等简单工具器材，完成这样艰巨的工程而赞叹。这项工程也因此被水利部誉为“导沭整沂，水利先锋”。导沭整沂工程的完成，减少了鲁南、苏北1450万亩土地的洪涝灾害，对沂沭地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对苏、鲁两省全面治理沂、沭河和南四湖流域创造了条件。

涑河

本 编

涑河，又名“小涑河”，古语流水速度快称为“涑”，由此得名涑河。涑河发源于费县芍药山西南峪村老庵子庙，流经芍药山、新庄、马庄、刘庄四乡镇，经西埠村流入兰山区。

明朝嘉靖年间，政府为了解决临沂城内百姓饮水以及灌满护城河所需，在义堂镇郭庄村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东入沂河，即今北涑河。涑河在临沂古城西门外分为两股，经过临沂原城西门城墙、北门，向东注入沂河，南股在蚂蚱庙附近注入护城河（即青龙河）。

涑河全长60公里，流域面积297平方公里，是临沂城区六大河流中惟一东西流向、横贯城区的河流，也是最能体现临沂城市特色的“商业生活长廊”和“历史文化长河”。“苍苍微曙霭高台，几树桃花昨夜开。疏柳啼莺三月届，断云迷雁九天来。千门辟尽晨钟散，百役奔初晓漏催。此际登临观下境，满城春色拥蓬莱。”这就是明代诗人舒祥描写的琅琊八景之一的涑河美景“平野晓霁”。





抗战初期的鲁南百姓 (下)

大荒堂主



依偎在车轮下的逃难村民



在荒凉的山间中露营



母亲与孩子



走过一城又一城



返回村中寻找食物的母子



告别家乡

临沂老童谣

一名

临沂老童谣的魅力，在于乡土田园之美。老童谣说的是方言土语，讲的是家长里短的故事，听起来趣味盎然。

《抱鸡谣》

抱鸡抱鹅，抱到碾砣，
碾砣下蛋，咯嘣两半。
风刮了，驴拉了，
俺那小鸡抱瞎了。

注：沂蒙乡村中，碾是最常见的生活工具。
孵小鸡在临沂叫做抱窝，抱瞎了，就是没有孵化的意思。

《喂饭歌》

格拉格拉冷冷，
小狗等等，
格拉格拉凉凉，
小狗尝尝。

临沂方言的“格拉”，就是搅动的意思。

《小叭狗》

小叭狗，叭狗叭，
俺上河南割(ga)庄稼，
急又急，渴又渴，
上俺丈人家找茶喝。
一看丈人不在家，
大舅子请，二舅子拉，
一拉拉到客(kei)屋里，
又吃烟又喝茶，乌木筷子叨豆芽，





大姨小姨都见了，就是不见俺那个她，
 东风吹西北刮，刮开门楼看见她，
 绿绫裤子红绫子褂，包银簪子好头发，
 皮底鞋。小莲花，腰里掖个素针扎，
 一走一揉（rou）达。

青涩小伙在未婚妻家中那种微妙的心思跃然可见。

在这个童谣中，河南，是泛指某条河之南，非河南省；“针扎儿”是一个饰物，形状细长扁平的，以便于把针“扎”在里面。旧时女孩佩戴针扎儿，主要是作为装饰。现在人们已经不知道“针扎”为何物了。揉达，就是摇摆的意思。

《扯大锯》

扯大锯，拉大拐，
 拉到官家，
 不给饭吃，
 一给给个驴屎蛋吃，
 烤烤，糊了，
 扑拉扑拉，没了。

注：扑拉扑拉，是指用手轻拂灰尘的意思。

《擀白菜帮》

擀，擀，擀白菜帮，
 擀到南园两大筐，
 一筐留着烙煎饼，
 一筐留着揍糊豆（粥）。

烙的煎饼甜丝地，
 揍的糊豆面溜地。

你一碗我一碗，
 咱俩喝得通红脸，
 你一勺我一勺，
 咱俩喝得通红脖，
 你一盅，我一盅，
 咱俩喝得醉烘烘。

注：揍糊豆，就是熬粥。满篇都是经典临沂方言，听起来亲切无比。

《织布谣》

小米豆（豆角），栽稽留（翻跟头），
 俺到南园织白纶，
 大哥嫌俺织得孬，
 二哥嫌俺织得绌（xiao，稀疏），
 三哥夺俺织布机，
 爹呀，娘呀，这个日子叫俺怎么过啊。
 大哥送到大门外，
 二哥送到二门外，
 三哥问俺多暂（什么时候）来，



杏花开，桃花败，
栗子开花俺再来。

注：织白纴，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李白诗中有“小姑织白纴，未解将人语”的句子。

织白纴，就是织苧麻布的意思。



《小麻妮儿》

花椒树，牵拉枝儿，上头坐个小麻妮儿，
脚(jue)也巧，手也巧，两把剪子一齐较，
左手较了个牡丹花，右手较了个灵芝草，
灵芝草上一对鹤，扑棱扑棱过江河，
江河江河这边是俺家，江河江河那边是您家，
铺上棉单损(打)芝麻，
一碗芝麻一碗油，喊她大姑嫂子来梳头，
左边梳了个盘龙座，右边梳了个站花楼，
站花楼上一滴水，正好滴她大姑嫂子的花裤腿，
嫂子嫂子你别哭，明天恁娘家拉着大车来叫你，
十匹骡子十匹马，
十个大剋(dakei，地位高的客人)还少俩。

注：麻妮儿，是指穿着麻布衣服的可爱女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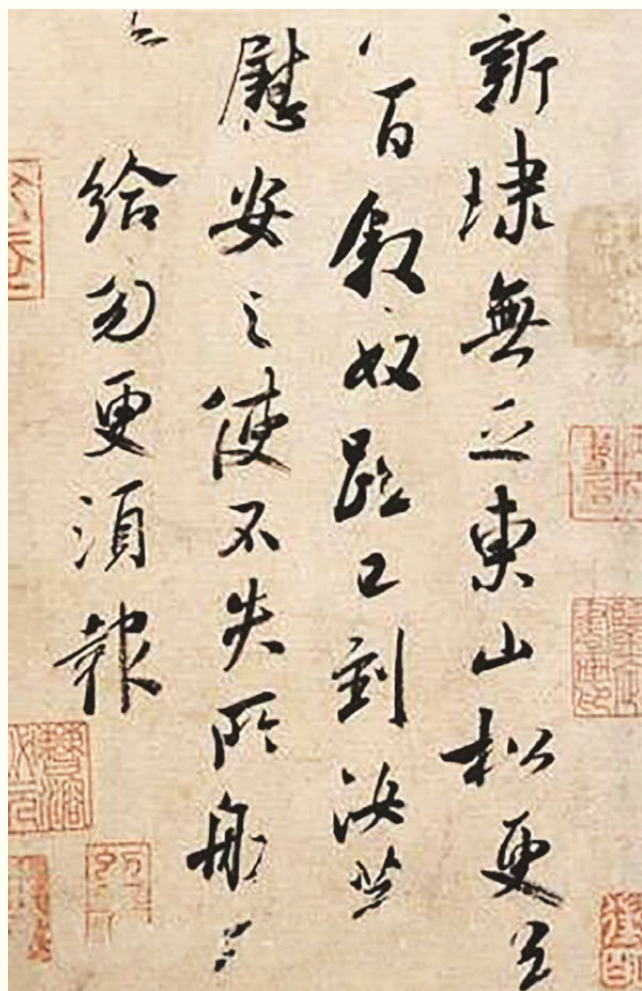
羊欣及其书法

羊氏文史考古

羊欣，字敬元，南朝宋泰山郡平阳（今山东平邑）人。曾祖羊忱，在晋朝曾任徐州刺史。祖父羊权，做过黄门郎。父亲羊不疑，任桂阳太守。羊欣年轻时性格沉静，不与人争强斗胜，言笑和美，容貌举止俱佳。广泛阅读经籍，尤其擅长隶书。不疑起初任乌程县令时，羊欣正好12岁，当时王献之任吴兴太守，很赏识他。献之曾在夏天来到乌程县官署，羊欣正穿着新绢裙午睡，献之在他的裙子上写了几幅字就离去了。羊欣原本擅长书法，由此书法更有长进了。最初出仕任辅国参军，军府解散后又回到家中。隆安年间，朝政逐渐混乱，羊欣在家中悠闲度日，不再仕进。会稽王世子元显每次要羊欣写字，（他）往往推辞，不遵命。元显愤怒，就任命（羊欣）为他的后军府舍人。这个职务本来由寒门担任，可是羊欣意态泰然自若，并不因高门任卑职而怒形于色，人们议论时都称赞他。羊欣曾拜访领军将军谢混，谢混先拂扫坐席更换服装，然后接见。当时谢混的族子灵运在座，他离开后，告诉族兄谢瞻说：“望蔡接见羊欣，就更更换服装和坐席。”羊欣由此更知名了。

桓玄辅佐朝政，领西平将军，让羊欣做平西参军，又转为主簿，参预机要事宜。羊欣打算主动疏远桓玄，故意不时泄露机密，桓玄察觉羊欣的心思，愈发敬重他，任命他为楚台殿中郎。对他说：“国家政务由尚书主持，朝廷礼乐由殿中省制定。你以前身处机要之地，与目前职务相比，还是轻的。”羊欣就职几天后，称病辞职，隐居里巷，十余年没有出仕。

义熙年间，其弟羊徽得到高祖信任重用，高祖对谘议参军郑鲜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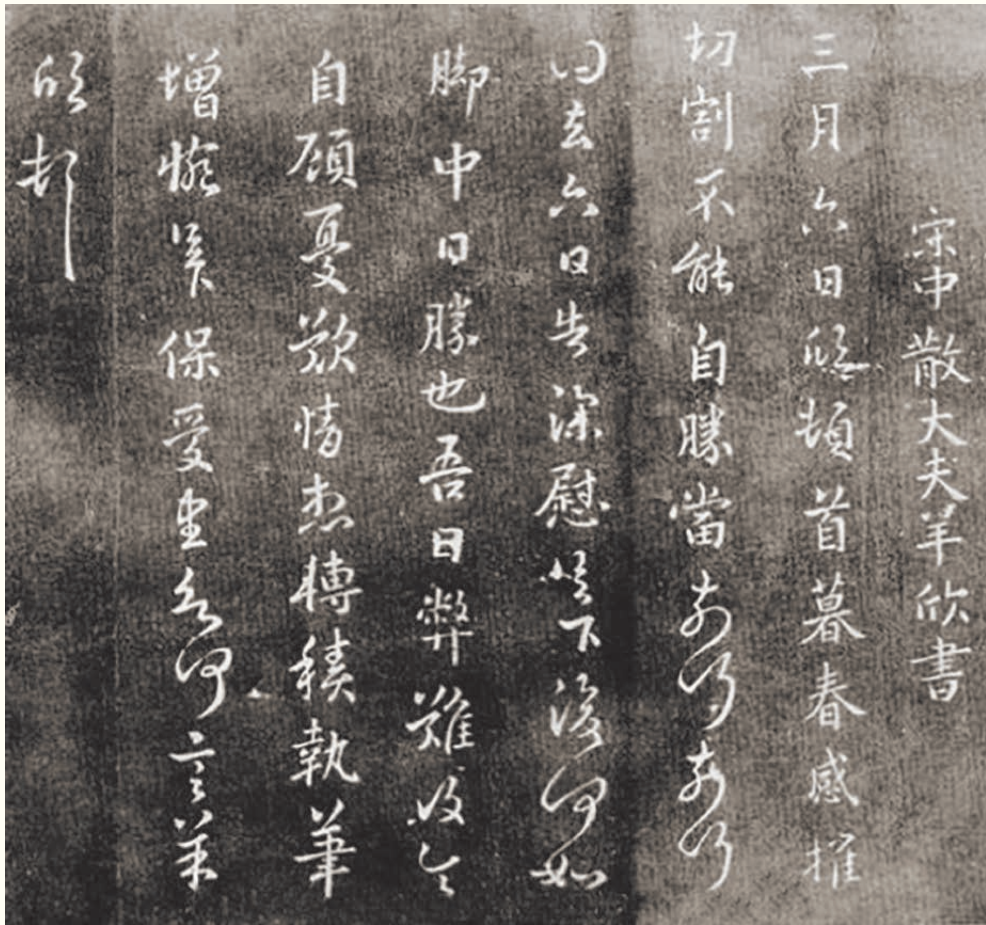
羊欣的书法真迹

“羊徽是一时杰出人才，舆论还认为他比不上兄长，未能结识羊欣，令人遗憾。”立即下书，把羊欣补右将军刘藩司马，又转为长史，又出任新安太守。在郡四年，以政治宽闲爱护百姓著称。除授临川王义庆辅国长史，庐隐王义真车骑谘议参军，都未就任。太祖敬重他，让他担任新安太守，前后共13年，其间游山玩水，很有怡情养性的乐趣。后来转任义兴太守，并非他喜爱的地方，不久，又称病重，辞职回家。被授予中散大夫。

羊欣平常喜好黄老之学，经常手抄黄老典籍，有病不吃药，只饮符水。他擅长医术，撰写《药方》十卷。羊欣因为不堪拜伏，便推辞不参加朝觐，高祖、太祖都没有见过他为遗憾。如果不是探访近亲，他不随便去别人家。出城一定要在城外，从来没有进过建康城门。元嘉十九年去世，时年72岁。儿子羊俊，很早便去世了。

《宋书·羊欣传》记载一段趣事，说的是王献之任吴兴太守时，羊欣父亲在乌程为令，羊欣年方12，王献之非常喜欢这个外甥。有一天，献之路过乌程县城，特地去看看羊欣。当王献之跨进书房时，却见羊欣身上穿着崭新的白绢裙袍正在睡午觉。王献之一向喜爱在洁白的衣服上写字，不禁来了书兴。他没有叫醒羊欣，而是不声不响地在羊欣衣服上挥笔写字，写着写着，羊欣的新衣上全写满了字。当羊欣一觉醒来时，看见自己身上写满了字，不禁惊讶万分，一问家人，才得知是王献之写的字，顿时又高兴起来，他立即叫人把这件裙服当作珍品保存起来。

羊欣是王献之外甥，跟随王献之学书法，隶、行、草书都很不错，名重当时，被评为“一时绝妙”“最得王体”。当时有一句流行的俗话说：“买王得羊，不失所望。”



暮春帖

羊欣传世书法作品有《暮春帖》《大观帖》《移屋帖》《闲旷帖》。

唐张怀瓘《书断·书断中》称：“师资大令，时亦众矣，非无云尘之远，如亲承妙首，入于室者，唯独此公，亦犹颜回之与夫子，有步骤之近。”

沈约云：“敬元尤善于隶书，子敬之后，可谓独步，时人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

羊欣的书法真迹已失传。北宋《淳化阁帖》中有一《笔精帖》传为他所书。另外，传世的王献之书迹中，可能混有他的作品，今已难辨。羊欣还撰有《续笔阵图》，已失传。又有《采古来能书人名》一卷，是中国早期的书家简史传著作。著录秦至晋代能书者69人，文中指出各家擅长的书体，对部分能书者有简要的评语，还辑录了部分书家的佚事异闻。

新四军军部旧址与河湾丁氏

丁兆铭

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临沂市河东区前河湾村。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在《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中，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总方针，决定从山东调兵急进东北，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根据中央部署，新四军第三师奉命进军东北，新四军第二、第四、第七师等主力北移山东，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1945年8月26日，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并要求他直接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工作。10月4日，陈毅到达山东军区驻地临沂，与罗荣桓交接工作并讨论人事及军事斗争等问题。1945年10月25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由苏北淮阴分批出发，移往山东



前河湾村

临沂。10月2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临沂城内天主教堂南堂成立。1946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机关合并，统一领导山东及华东地区的军事斗争，中共中央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此前此后的一段时间，机构均驻临沂城内天主教堂。1946年6月，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机关从天主教堂迁至沂河东岸前河湾村丁氏庄园，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迁到前河湾村丁氏庄园。1946年11月，华中分局机关从淮阴北迁前河湾村之后并入华东局，进驻丁氏庄园。

前河湾村，与西南方向的临沂城，隔河相距20华里，其地理位置优越，宽广的沂河水滔滔南下，河水在这里向西打了一个弯，又折东向南而去，形成了一个半岛地形，河湾村由此得名。这里为兵家驻军养兵难得之地，此处十分隐蔽、十分静僻，又兼北可方便地进入沂蒙山腹地，因此新四军军部驻此近一年，临沂国民党政府及驻军竟未发现。这里土地肥沃，一马平川，旱涝保收，人民富庶，而且这里群众基础好，爱党拥军的优秀传统由来已久。河湾丁氏、钟氏等姓和睦相处，世代繁衍生息在这里。丁氏为河湾村望族，为方圆几十里之首富，当时就流传着丁家有“千亩良田，万株果园”的说法。丁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被称为“丁氏庄园”，由清末民初丁风翔（清末在沂州府钱粮房任职）初建，子孙辈不断扩建完善，成青砖小瓦的四合院四座。四座四合院分布四方，于是就有了南大门、北大门、东大门、西大门（也叫东院和西院）之称。新四军北上来到这里，当时开明的丁氏就把整个大院捐献出来。据现今在世的丁风翔的重孙丁洪范讲，他听奶奶朱氏说，当时捐房时，丁洪范的大爷爷丁振铎，爷爷丁振声早已过世，伯父丁锡灵、丁锡月也已去世，捐房当事人是长支的丁锡伦、二支的朱氏和丁锡汉、丁锡玉母子（丁风翔有两子，长子丁振铎，次子丁振声。丁振铎有两子，长子抱养，次子丁锡伦；丁振声有四子：丁锡灵、丁锡月、丁锡汉、丁锡玉）。

新四军军部旧址原为丁锡伦的四合院。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1946年6月从城内天主教堂迁至前河湾，即进驻丁锡伦家四合院。1947年2月遭敌机轰炸，院墙被毁，建国后用为小学（2007年恢复原貌）。军部设有陈毅办公室、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军部办公室，分设参谋处、情报处、通讯分局等机关。



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
新四军军部旧址

华东局旧址原为丁锡月家四合院。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临沂天主教堂南堂成立。1946年9月迁至前河湾丁氏庄园内丁锡月家四合院。1946年11月华中分局机关从淮阴迁至前河湾村，1947年1月并入华东局，1947年2月华东局机关由此北移经汤头王疃至沂水王庄。

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旧址原为丁锡伦家四合院。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简称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于1946年9月2日成立，1947年1月30日在前河湾村扩建为新的支前委员会，1947年2月13日支前委员会随华东局机关北移。该委员会受华东局、山东省政府直接领导，平时负责部署各级政府与支前机构的一般性支前工作，战时则负责支前的物力和人力调配工作。1948年11月4日为支援淮海战役改编为华东支前委员会，为支援淮海战役做出了重大贡献。

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诞生地旧址原为丁锡灵四合院。1947年1月23日，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总部机关在前河湾对华东部队进行整编，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同时取消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番号。旧址于1947年2月遭敌机轰炸损毁。

华东军政大学纪念馆，旧址在今九曲镇杨庄村。华东军政大学初期为华东军事政治学校，1946年1月筹建，1946年3月与党校合办于九曲镇杨庄村。1946年8月与华东通讯学校、淮南随营学校合并，改称为华东军政大学，校址移至前河湾村附近，1946年9月东江纵队干部编成东江纵队教导团进入军政大学学习，11月初开始离开前河湾到莒南大店与华中雪枫军政大学合并。

军部直属野战医院旧址原为丁锡汉、丁锡玉四合院。1945年10月，军部直属医院随卫生部北上临沂，1946年1月进驻前河湾。据河湾丁立芝、丁清成回忆，院长姓姚，女性，住在炮楼中。卫生部和医院门诊，设在丁氏庄园丁锡汉家四合院，野战医院的大伙房设在丁氏庄园丁锡玉家四合院，手术室设在前河湾村民孙培顺家。1946年2月至4月，罗炳辉将军曾在此休养；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期间有大量伤员在此处治疗。1946年9月原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在此治疗，陈锐霆受粟裕委托特意来此看望。1947年1月底，野战医院伤员开始向北迁移。

新四军军部直属被服厂旧址，原为丁锡伦四合院。1945年10月，新四军直属被服



陈毅旧居

厂随军部直属队北上临沂，工人约有百人，有时临时雇佣村民。厂址设在丁氏庄园丁锡伦的四合院及院外西南方的西园，四合院中设有机房和办公室，西园设有仓库和宿舍。1947年2月随军区机关北撤。

罗炳辉旧居原为丁氏庄园中丁锡伦西园中的储料房。有房三间，东厢房二间，院内久空，无人居住，院墙有紫藤缠绕。罗炳辉1946年2月至4月居住于此。

陈毅住宅在丁氏庄园西北角。张云逸副军长夫妇住宅为丁清吉老宅，土墙、草房、独院，新四军一来，丁清吉主动搬走，把自己的房屋让给张云逸副军长一家住，至今保存完好，位置在今新四军军部旧址暨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诞生地纪念馆前方。

在前河湾丁氏庄园，华东局、华东野战军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在这里酝酿、形成并实施了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前河湾村丁氏庄园，陈毅、粟裕、张云逸等指挥了著名的鲁南战役、临沂南线阻击战，有力地阻遏了国民党军队的北进。制定了莱芜战役的作战方案、初步酝酿形成了孟良崮战役的作战思想和思路。1947年1月鲁南战役胜利后，华东部队在前河湾村进行整编、合编。整编后的华东野战军在前河湾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重要报告。1947年2月6日，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奉命进行讨伐反复无常的国民党顽军郝鹏举的战役，全歼郝部2个师和军部共6000余人，并生擒郝鹏举。在丁锡汉的四合院东屋，陈毅当面严斥郝鹏举背叛人民的罪行，并作《示郝鹏举》一诗：“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后来，郝鹏举在被押送途中企图逃跑被击毙。

党群军民鱼水情深。新四军在前河湾近一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许多拥军爱民的佳话。

这里群众基础好，军民关系融洽。军部搬来后，指战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空闲时战士们为群众挑水、扫地、帮干农活，群众也自觉帮着部队干些活，新四军则惜力爱民，给以报酬。干一天活给10斤小米，当天结清（当时多以粮代币）。人民军队爱人民，野战医院的军医为群众看病从不收钱，护士们则利用空闲时间，在树林中作简易教室，教当地“识字班”学文化。在前河湾村，陈毅小儿子陈小鲁就出生在房东钟维君家。张云逸长子名大华，已十几岁，跟随在父母身边，经常和丁立芝等同龄人在一块玩，甚至相互到家中玩，首长和群众犹如亲密邻居（据丁立芝回忆）。

在前河湾村，山东军区艺术团经常举行演出或军民联欢，慰问军民。一次在河滩上演出了《火烧西水湖》。（丁洪范回忆）军部曾在前后河湾之间空地上召开过一次万人大会。

1947年2月，军部撤离前河湾后三天（旧历正月十五日），多架次国民党飞机从徐州起飞来河湾村进行轰炸，军部旧址仅余房屋8间（陈毅、张云逸旧居幸存），前后河湾村民被炸死几十人，仅后河湾村就有13人（据丁立芝回忆）。丁锡伦的重孙乳名“甜蜜”（音），当时才8岁，被飞机上机枪射中腹部而死（丁洪江、丁洪范提供）但河湾村人民不怕牺牲，毫无怨言，积极组织起来进行自救，前赴后继，继续投入到支援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去。

今天，大美临沂日新月异，沂蒙人民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沂蒙精神，正在建设着自己的家乡。前河湾村现在是旧貌换新颜，建成了河湾新社区，这里已是新楼高耸，交通四通八达。原河湾丁氏庄园已成红色旅游点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在军部旧址的前方街南，仿建的沂州古城即将竣工。一桥飞架东西，南京路大桥（也称河湾立交）从临沂北城南坊跨过沂河，直通河湾村，河湾丁氏及各姓都在幸福地生活着。

为充分保护和利用好这里的历史遗迹，进一步弘扬沂蒙精神，2004年5月，中共



前河湾村

临沂市委、河东区委、区政府，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决定对新四军军部旧址暨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诞生地进行原样修复。自2005年9月起，按照“修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对旧址实施修复，同时征集革命文物进行陈列展览，并进行园林绿化。2007年9月27日，新四军军部旧址暨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诞生地纪念馆正式开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为纪念馆题写了匾额。馆内设有史料展览室和陈毅办公室、军部办公室等。

新四军军部旧址先后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临沂市党员教育基地、临沂市国防教育基地、临沂市廉政教育基地。

山东世家大族的南迁 (下)

国家史册

兰陵萧氏

据历史考证，兰陵萧氏原籍兰陵郡兰陵县（治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一说为今山东枣庄市峰城镇东），西晋灭亡后，南迁江南，居住在东晋晋陵郡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东晋政权在当地设置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以后这一地区便被称为南兰陵，因此萧氏也被称为南兰陵人。

东晋时期，萧氏还是寒门，到了南朝时期逐渐成为豪门，所以说它是后起的新门。刘裕的继母萧氏出自兰陵。自从刘裕执政到刘宋时代，萧氏家族依靠与刘氏的姻亲关系，地位开始上升。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在这一时期，萧氏族人多是将军，多因军功显要，才挤入了士族阶层，并不是高门。

刘宋之后，兰陵萧氏连续出了两朝帝王，这才使得萧氏与王、谢、袁等豪族一样成为一等士族。在南朝，出身寒微却因军功而显达的人有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并不多，至于成为高门、甲族的就更少了，萧氏一族算是唯一的一家。兰陵萧氏南迁后，比较著名的有三支，即萧思话、萧道成、萧衍三支。

萧思话一支：萧思话的祖父萧卓，曾为东晋洮阳令，姑母萧文寿，是刘裕的继母，生长沙景王道怜、临川烈王道规。刘裕称帝后，萧氏为皇太后。萧卓被赠授金紫光禄大夫，封为封阳县侯。萧思话的父亲萧源之继承了萧卓



的爵位，被委任为徐、兖二州刺史。萧源之死后，萧思话又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在元嘉年间先后担任过青州刺史、梁南秦二州刺史、雍州刺史、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中书令、丹阳尹等职。萧思话死后，长子惠开承袭其爵位。特别是惠开时，萧氏又强化了与刘氏宗室的姻亲关系，惠开的妹妹嫁给了桂阳王休范，惠开之女嫁给了孝武帝之子。惠开死后，其子睿承袭爵位，到齐朝建立后，其封爵才被削除。

萧道成一支：萧道成的高祖萧整曾担任淮阴令，其曾祖父萧儁曾任即丘令，其祖父乐子曾任辅国将军。其父萧承之，由于受到萧源之的提携，于宋元嘉中期跟随萧思话平汉中，被提升为龙骧将军，后被任命为南泰山太守。萧道成在宋文帝时先为偏将，后被雍州刺史萧思话任为太军中兵参军。后来又任建康令，并得到少府萧惠开的赏识。宋明帝时，道成任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逐渐掌握了军权。后来数年间，在经历过齐公、齐王后，取宋自立，建立了齐朝，是为齐高帝。萧道成称帝四年后死去，其子萧贲（武帝）即位，武帝嫡长子长懋早死，武帝舍弃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不立，而立长懋之子萧昭业为太孙。萧昭业继立后，大权被受诏辅政的萧鸾（道成之侄）把持，萧鸾后来杀死昭业，另立昭业弟昭文；后又迅速杀死昭文自立，是为明帝。明帝在位五年，杀人甚多。齐高帝19子、武帝23子除萧嶷一支有后人外，其余都被杀尽。明帝死后，其子宝卷即位，仍继续滥杀宗室，最终被梁武帝萧衍攻灭。萧嶷是萧道成的次子，宋武帝时担任太尉大司马等职，永明十年（公元492年）病死。世子萧子廉曾任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将军。子廉之子元琳，梁代齐后任新淦侯。

萧衍一支：萧衍与萧道成同出于萧整，萧整之子萧轶，为萧衍高祖，曾任济阴太守。萧衍曾祖父副子，任州治中从事。祖父道赐，任南台治书侍御史，父顺之，是齐高帝始族弟，深得信用，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丹阳尹等职。萧衍很有文才，是齐竟陵王子良西邸八友之一，后为官至雍州刺史，掌握着重兵。在齐末混乱中，代齐自立，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侯景攻下台城后，老饿病死。侯景立萧衍第三子萧纲为帝（即简文帝），作为傀儡。后又改立萧衍长孙萧欢之子萧栋为帝。不久，侯景又杀死简文帝萧纲以及他的10多个儿子。梁宗室还有许多人也被杀害。侯景之乱被平定后，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即皇帝位（即梁元帝），定都江陵，但3年后就被西魏政权攻灭。西魏又扶持昭明太子的第三子萧督为梁帝，历史上称其为后梁。此时曾起兵讨伐侯景的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则在建康拥立梁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敬帝），不久又被陈霸先废掉，霸先自立，梁朝灭亡。

从当时情况看，萧衍这一族在皇室内部斗争以及侯景之乱中损失较大，但在陈朝建立后，其大部分留在陈朝，仍为甲族，但没有太知名的人士。

到了隋唐时期，萧氏势力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主要是指萧衍这一支势力。此支中在《隋书》与新、旧《唐书》中入传者达到23人之多，其中4人是萧衍兄弟的后代。其余19人全是萧衍的孙子、后梁皇帝萧绎的后裔。这19人中有9人为宰相。萧岿的后裔在隋唐时期势力之所以发展强盛，是因为萧岿之孙女为隋炀帝皇后，隋灭后梁后，萧岿子孙有很多人在隋朝为官。到了五代时，萧氏家族的势力明显衰落，其家族成员中入《五代史》之传者仅有二人，即萧顷，他在后梁为官至同平章事；萧顷之子萧源，在后唐为官至秘书监。北宋统一后，兰陵萧氏作为一个士族家族，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

琅琊颜氏

琅琊颜氏起源于曹魏时期的颜斐、颜盛，颜斐曾担任过黄门侍郎、京兆太守，颜盛曾任青、徐二州刺史。兄弟二人在曹魏时期从鲁（今山东曲阜）迁到临沂（今山

东临沂)。自此以后琅琊颜氏主要指的是颜盛的后代，颜盛生子给事中颜钦，颜钦生汝阴太守颜默，颜默生颜含。西晋灭亡后，颜含随司马睿渡江，颜氏于是成为随晋元帝渡江的百家“中原冠带”之一。颜含过江前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司马参军，过江后历任东阳太守、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大司农等职。应该说颜氏家族自此时起在士族中开始有了地位。颜含生颜髦，为官至侍中、光禄勋等，髦的弟弟颜谦、颜约同任官至太守。颜髦生颜琳，做官至骑都尉，颜约生颜颐做官至扩军司马。颜琳生颜靖之，做官至宋御史中丞，颜显生颜延之，为官至宋秘书监、光禄勋。颜靖之生颜腾之，做官至宋巴陵太守，颜延之生颜竣，做官至宋散骑常侍，颜腾之生炳之，炳之生见远，做官至齐御史中丞。见远生颜协，颜协做官为梁湘东王国常侍，又兼记室，颜协生之推、之仪。梁朝末年发生侯景之乱，这场叛乱被平定后，萧绎于江陵称帝（国号仍为梁），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当西魏军攻克江陵后，之推投奔北齐，做官至黄门侍郎；后来归入北周担任御史上士，归隋朝后任太子学士。之仪北周时为官至御正中大夫，归入隋朝后任集州刺史。颜之推有三个儿子：思鲁、愨楚、游秦。颜游秦在唐初历任廉州刺史、郢州刺史。颜思鲁有四子：师古、相时、勤礼、育德。颜师古唐初担任过中书侍郎、秘书少监等职；颜相时曾任谏议大夫、礼部侍郎；颜勤礼曾任弘文、集贤学士。颜勤礼生昭甫，昭甫为官至曹王侍读。昭甫生元孙、惟贞。元孙生春卿、杲卿、曜卿。春卿曾任官蜀尉、偃师丞。杲卿任假常山太守、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安禄山叛乱起，杲卿坚决抗击，结果被安禄山杀害。颜惟贞生真卿，真卿先后担任过侍御史、平原太守，他也坚决抗击安禄山的叛乱，在抗击安禄山失败后，颜真卿西入长安，任御史大夫，后来奉命出使淮西，劝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归顺朝廷未果，结果被李希烈杀死。杲卿生有泉明、季明二子，泉明官至彭州司马，季明被安禄山所杀。颜真卿生有二子。皆为地方官，文宗时颜真卿的曾孙弘式被任命为同州参军。自此以后，颜氏家族再没有显要记载。

总之，自曹魏至唐朝后期的颜氏家族20代中，几乎没有不为官者，所以称颜氏家族是一个士族家族。这个家族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家族成员所任官职不是很高。这个家族中除了第五代颜髦在东晋时曾任侍中外，其他各代大多担任县令、郡



守、刺史、舍人、学士、博士、少监、给事中等职，最高也不超过常侍、秘书少监、光禄勋、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这说明这个家族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士族家族，其权力不如清河崔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的强。二是这个家族是经学世家。颜氏家族虽然势力不是很大，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这就是掌握了较高的封建文化。例如，颜斐因为有才学而被召为太子洗马；颜钦因为精通《韩诗》《礼》《尚书》等经典，使许多学者都追随他的学识；颜含因为精通儒学、礼仪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本州大中正；颜延之因为与以儒学著称的周续之辩难《礼记》出名而受到宋武帝刘裕的赏识，被提拔为国子祭酒、秘书监等职；颜见远因博学有志行，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录事参军；颜之推早传家业，满腹才学经文，曾任国左常侍、中书舍人和黄门侍郎等职；颜之仪因为博涉群书，好为辞赋，进入北周后任麟趾殿学士、太子侍读；颜师古更是一代儒学大师，曾任秘书少监；颜相时、颜勤礼也都是以精通儒学而闻名，并都任弘文、崇贤学士职务；颜真卿少勤学业，既擅长博学，又专于辞章，中进士后又擢制科。三是这个家族还是书法世家。例如，颜协精工篆籀（大篆）、飞白；颜勤礼工于篆籀；颜昭甫工于篆籀、草隶；颜元孙因精通历代书法，而被玄宗召去鉴定家中诸家书迹的真伪。再如颜真卿更是著名的书法大师，他早年曾两次辞官去洛阳跟当时的大书法家张旭学习书法，他不仅继承了张氏书法的长处，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书法特点，即楷书气势雄浑、形体敦厚；行书圆熟流畅、刚劲有力。他的书法艺术对当时和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颜氏家族作为一个士族家族，虽然在唐朝后期已经衰败了，但其影响仍然存在。

泰山羊氏

泰山南城（今山东平邑南）羊氏家族自羊续起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士族世家。羊续为东汉南阳太守，他有三个儿子：羊秘任曹魏京兆太守，羊衡任曹魏上党太守，羊耽任曹魏太常。到了西晋时，因为羊祜是开国元勋，加上羊祜之姊羊徽瑜是司马师之妻，所以使羊氏家族的势力达到最强。进入东晋南北朝以后，羊氏家族的势力和影响开始减弱。

如果从羊续开始算起，羊氏家族大致可分为三支：羊秘一支的子孙一直延续到南朝宋时，在朝为官者居多。羊秘有二子：羊祉任魏郡太守，羊繇任车骑掾。羊繇有五个儿子：羊亮任晋大鸿胪，羊忱任晋徐州刺史。羊忱有二子：羊楷任东晋尚书都官郎，羊权任东晋黄门郎。羊楷之子羊绥任东晋中书郎，羊绥有三个儿子：羊玄保任宋金紫光禄大夫，玄保兄弟擘、辅没有做官。玄保有三子：戎、咸、粲都没有做官。玄保之兄之子希任宋广州刺史，羊希之子崇任宋尚书主客郎。羊权之子不疑任东晋桂阳太守，羊不疑有二子：羊欣任宋新安太守，羊徽任宋河东太守。

羊衡一支，在西晋时势力与影响较大，到了南北朝时其为官者很少了。羊衡有三个儿子：羊发任晋都督淮北护军，羊祜任晋征南大将军，羊承没有做官，羊衡之女徽瑜是司马师之妻，入晋后称为弘训太后。羊发有四子：羊伦任晋散骑常侍，羊暨任晋阳平太守，羊伊为晋平南将军，羊篇为晋散骑常侍。羊暨有二子：羊曼任东晋丹阳尹，羊曼之子羊责任东晋秘书郎，羊曼之弟羊聃任东晋庐陵太守。

羊耽一支延续的时间比较长。羊耽有二个儿子：羊瑾任晋尚书右仆射，羊琇任晋中护军。羊瑾之子羊玄之任晋尚书右仆射，玄之之女献容是晋惠帝皇后。羊琇的五世孙规之任南朝宋任城令，后来归降北魏，任雁门太守。规之有三子：羊祉任北魏梁州刺史。羊祉有十子：次子羊深任北魏中书令，羊深之子羊肃任北齐武德郡守，羊深的弟弟侃、默、忱、给、元等都南归梁朝，除了侃任梁都官尚书外，其他人均任刺史。

他们的后代也有不少在朝为官者，直到隋朝。

东海王氏

东海王氏开始于东汉末年，兴盛于魏晋。东汉末年，东海郟人王朗，字景兴，在魏文帝时任司空。他还著《易》《春秋》《孝经》《周官》等传。王朗之子王肃博取众家之说，曾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作解，成为一代儒师，并在曹魏为宫中领军和散骑常侍。

王肃有八个儿子，长子王恽，早死，无子。其余诸子中较著名的有：王恂为官至晋河南尹、侍中；王虔为官至尚书；王恺为官至后将军；王隆为官至后将军。其中尤以王隆一支最为兴盛。王隆之子王景，在晋为官至大鸿胪。王景之子王雅，在晋为官至领军、尚书、散骑常侍。王雅长子准之，任散骑常侍；王雅次子协之，任黄门；王雅次子少卿任侍中。准之之子延年，延年之子僧孺都是南朝著名文人，都担任过齐、梁南海太守等。

高平郗氏

高平郗氏在两晋时期地位和影响力比较显著，到了南朝以后其地位逐渐衰落。西晋时，高平金乡人郗鉴因博览经籍，成为著名的儒士，西晋时任中书侍郎，东晋时先后担任过兖州刺史、安西将军、都督扬州江西将军、假节、尚书令、司空等职，其影响较大。他有两个儿子：郗愔、郗昙。

郗愔曾任东晋徐兖二州刺史、假节，任刘宋镇军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郗愔有三子：超、融、冲。其中又以郗超最为有名，他曾任东晋中书侍郎、临海太守。郗昙任东晋北中郎将、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等职。郗昙之子恢任东晋尚书。

进入南朝以后，高平郗氏中的郗焯娶宋文帝之女寻阳公主为妻，并任宋太子舍人。郗焯之女郗徽任梁武帝萧衍早年之妻，被追封为德皇后，郗焯之子郗泛，曾任梁中军临川王记室参军。

平原华氏

平原华氏自华歆开始，成为显赫家族。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东汉时任县吏，后来考取孝廉。魏文帝时，官至司徒，明帝时任太尉。华歆有三子：长子华表，任晋太子少傅、太常；次子华博，任晋三县内史；少子华周，任晋黄门侍郎、常山太守。

华表长子华廙，任晋尚书令、太子少傅；华廙之弟华峤任晋秘书监、尚书；华峤之弟华谈任晋河南尹；华表的其他儿子名位不是很显要。华廙有三子：华混任晋侍中、尚书，华混之子华陶任巩县令；华廙之子华荟任晋河南尹；华廙之子华恒娶晋武帝之女荥阳长公主为妻，曾任东晋左光禄大夫。华恒之子华俊任尚书郎，俊之子仰之官至大长秋。

华峤有三子：颀、彻、畅。华颀任晋长乐内史；华畅有才思，中年遇害；彻生平不详。

华谈之子华轶，曾任晋江州刺史，后被东晋元帝所杀。

新时代乡镇党委书记楷模许步忠

衣方杰 王富军



2018年10月21日深夜的临沂城，一场秋雨来去突然，让人更感突然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意外终结。

许步忠，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党委书记，在这个飘着细雨的夜晚，因连续工作劳累过度，突发疾病抢救无效，走完了他年仅43岁的一生。

“一位好干部，就这么走了。”消息迅速传开，街头百姓说：

“感觉没了依靠，今后工作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工作搭档说：

“请你们好好写写他，对他是种告慰，对基层干部是种激励！”老领导说……

这个人都做过哪些事，会让他人惋惜、不舍？他年轻的一生，又曾有过怎样的风景？

破题不难，难在“公正”二字

“许书记您怎么来了？”21日上午10点半，临沂凯源木业董事长孟祥晓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抬起头时，意外发现办公室里不知何时来了一位访

客，来人正是义堂镇党委书记许步忠。

“我我是想跟你谈谈前些天你跟我说公司要新上一个项目，涉及土地流转问题，平时工作忙，趁着周末赶紧来跟你合计合计。”许步忠开门见山。“这点小事，您还记在心上啊？”“这可不是小事，涉及咱镇几百亩的土地流转呐。”……商量两个小时后，许步忠感觉身体不适，起身告辞。孟祥晓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和许书记最后一次见面。

在很多人看来，基层工作虽纷繁复杂，但作为一个乡镇“一把手”还凡事亲力亲为，为企业跑前跑后，多少让人难以理解。

事实上，只要了解义堂镇发展，了解许步忠的为人，也就不难理解了。义堂镇是全国文明的“板材之乡”，全镇共有各类木业加工企业4300余家，家庭式小作坊上万家，在全国板材市场中占有1/4以上的市场份额。红火的产业背后，代价也是巨大的。与全国1/4的市场份额相“匹配”的是义堂的火警数量占到了全区的1/4，“小散乱污”数量众多，环保和安全双重压力，像两座大山压在义堂全体党员干部心头，“工业围城”问题成为心腹大患。

难题如何破解，2016年12月任义堂镇党委书记的许步忠给出的答案是：不破不立！2018年以来，义堂镇累计拆迁350万平方米，腾出发展用地7000余亩，山东俏家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铁路物流园等一个个绿色环保的新项目在“废墟”当中拔地而起。

“千难万难，拆迁最难。”拆迁是基层工作的硬骨头，而义堂今年一个镇的拆迁量就是2017年兰山区全区拆迁量的两倍。起初，以拆促建的做法让很多人难以理解，有企业主说，我是你们的纳税人，把我撵走了，你们能有什么好？村干部说，我们这样干了30年，现在把企业撵走了，我们靠什么？老百姓说，我们得打工养家，你们把企业都拆了，我们上哪里打工？

面对村干部、企业主、老百姓的种种质疑，甚至是上门诘难，许步忠从来不会回避、不推诿，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办公室的大门永远向大家敞开”，任何问题都可以坐下来、摆上桌心平气和地谈。于是，义堂镇的工作人员经常看到这样一幕，很多人怒气冲冲走进许书记的办公室，心平气和甚至喜笑颜开地离开。有人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拆迁只要讲求‘公正’二字，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义堂商会党委书记李继品回忆说：“许书记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人品更是没话说，从义堂镇的企业家嘴里，我从来没听到关于许书记的半句坏话，这是实话。”

许书记有句口头禅：“没问题，你放心”

了解许步忠的人都知道，他还有一句口头禅：“没问题，你放心。”

兰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沈如茂说，“不管问题大小，事情缓急，步忠同志这两句，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的担当精神，更是一种强大自信的展示。”

基层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身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除了要有一颗能承受巨大压力的强大心脏，还要有一副钢铁之躯。曾在李官镇与许步忠共事6年的柳青街道办事处主任孙鹏飞回忆说，2011年11月，许步忠到李官镇任职人大主席，那时候正是镇上推进土地增减挂工作的关键时期，34个村的搬迁上楼和拆迁复垦工作是摆在所有人眼前的一道“大坎”，村民对政策的不理解、对“上楼”的抵触情绪、对楼房分配的“患不均”让土地增减挂工作推进举步维艰，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而许步忠没有退缩，毅然决然顶在了第一线。

晚上开会研究搬迁方案到半夜12点，早上5点到搬迁现场维持秩序，连续一个多月吃住在单位，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这是当时许步忠的生活状态，“那时候我住在三楼，步忠住在四楼，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步忠穿着拖鞋在楼上来回踱步，我知道他工作压力大，劝他要注意身体，他说‘老孙啊，我觉得每搬迁一个村，就像过一座火焰山，什么时候全搬完了，这一座座的火焰山才算彻底迈过去了，我才敢歇着呀。’”

许步忠图什么？大伙儿心里都很清楚，他在意的是全镇百姓安居乐业，是自己身上担着的这份责任。

今年56岁的郭道祥是义堂镇小义堂社区人，因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家境贫困。去年8月，许步忠到社区走访了解郭道祥的情况后，二话没说给他买了一台新轮椅。“许书记知道我喜欢在网上写东西，看我家里的电脑破旧，又安排人给我换了一台电脑。去年春节前，许书记还专程来看望我，心里别提多热乎了。”郭道祥说，“许书记是个好干部，心里有我们老百姓，这样的人不该走得那么早啊。”

他走了，带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许步忠心里装着百姓、装着企业、装着使命、装着责任和担当……他心里装着太多东西，唯独没装着他自己。

一次在王家朱里社区开完现场办公会后，已是深夜，许步忠靠在会议室的椅子上、脚搭马扎沉沉睡去。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玉华轻手轻脚地将一件外套盖在了许步忠身上，许步忠一下子醒了过来。“许书记，回去睡吧。”李玉华劝说道。“算了，回城路上看到消防车我就担心是不是咱们镇上出了问题，提心吊胆的，回去也睡不踏实，还不如在这里眯一会。”

在义堂镇，许步忠工作拼命是出了名的，最早一个来，最晚一个走，镇党委政府办公楼，最后熄灭的那盏灯大多时候都是许步忠办公室的那一盏……

对于家人，许步忠心存愧疚，却从不缺乏温情：他会在每个深夜回家后摸一摸儿子熟睡的脸庞，会在繁重的工作当中抽时间回老家陪父母吃一顿团圆饭，会在今年国庆期间带着妻子到义堂镇的在建工地上“旅游”，会在工作压力难以排解的时候向好友诉说苦闷却不愿让家人担心……但这个当父亲的有时确实“糊涂”，“糊涂”到只知道儿子中考考了685分，却不知道满分是多少。

去世前，许步忠又已连续十多天不曾回家。10月21日中午12点30分，突感头晕的许步忠从孟祥晓办公室走出后被送到了义堂镇医院，下午15点30分，被转院至临沂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当晚11点，义堂镇镇长刘振超接到了许步忠的最后一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市人民医院。见面后，许步忠告诉刘振超他要做一个小手术，嘱咐他替自己向区委区政府请假，又交代了近期的几件紧要工作。

被推进手术室前，许步忠凝望了妻子一眼，却没有留下一句话。22日凌晨零点13分，许步忠因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43岁。这位辛劳一生的好“班长”，永远离开了我们，在银杏树叶开始泛黄的季节，带着他对老百姓无限的爱，带着对党的事业无限的忠诚，带着他未完成的使命憾然离去……

一位青年中医传承人的国医情怀

——话说朱法永

胡爱军

朱法永出生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乡亲们因病致贫的艰辛，让他刻骨铭心。为此，他从小立志做一名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良医。

1989年，他考入山东省中医药学校。在校期间，他系统学习了中医药基础理论，从我国历代医学名家名著中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对国医国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他从孙思邈、白求恩、希波克拉底这些前辈的故事中懂得了做一名优秀医生所必须具备的崇高境界，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立志高远、勤奋学习、从医报国的理想和信念。



盛年变法为国医

1993年，朱法永从省中医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沂市中医医院普内科，从事的是西医专业，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这期间，他又刻苦钻研西医理论技术，由一名普通住院医师逐渐成长为科室业务骨干。2000年至2001年，他在山东省省立医院系统进修学习西医内科呼吸系统疾病临床诊疗，回来后在本院首次开展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技术的临床应用，拓展了本专业业务范围。他的工作热情、吃苦精神和所取得的业绩，受到医院领导和同行的普遍赞赏。

正当朱法永的事业和人生春风得意、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不幸中之大幸的特殊际遇，让他下定决心，盛年变法，改弦更张，另辟蹊径。

事情要从2008年说起。由于职业原因，这一年，他和本科室的另外两个同事同时被确诊感染了结核分支杆菌，患上了肺结核病。当年，朱法永35岁。肺结核曾经是骇人听闻的高死亡率传染病，是人类长期无法逃避的巨大威胁。19世纪，结核病被称为“人类死亡之首”，每7例死亡中就有1例死于结核病。《黄帝内经》称结核病为“传乘”之病，后人称其为“虚劳”“肺癆”，《内经》描绘其症状为“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腠”，令人闻之色变。随着人类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如今结核“病魔”已经被征服，而且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经典案例。但是，就目前的医疗水平而言，肺结核病从治疗到痊愈仍然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平均每10例病人中仍然有1例有复发的可能。

朱法永作为呼吸科专业医师，深谙其害。但他并未因此而畏惧、委顿和消沉，而是凭借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在遵循西医常规治疗的同时，开始探索中西医结合和纯中医治疗的方法，以期找到一条更为有效的治疗途径。

按照传统中医理论，肺癆的病因是火盛金衰、元气损耗所致，治疗法则通常以补虚为主。一开始，朱法永按照传统观点和教科书照本宣科，处方抓药，为自己治病。其结果，病情不仅没有起色，身体状况反而每况愈下。后来，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一个在电力三公司医院工作的同学。这个同学是搞纯中医的，他说“你正好治反了”，同时向他推荐了一个四川名医，说他开的药不难喝，你可以去试试。他同学所说的名医，正是国内中医扶阳派领军人物、人称“小火神”的卢崇汉老先生。

所谓扶阳派，又名火神派，形成于清末光绪年间，是中医学中一个比较年轻的流派。开山宗师是晚清伤寒大家郑钦安。扶阳派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尤其擅用附子。由于附子在热药中的首要地位和代表意义，乃至诸多扶阳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某扶阳”或“某附子”的雅号。卢崇汉出身中医世家，师从祖父卢铸之、伯父卢永定。二卢皆号“火神”。祖父卢铸之除家学之外，曾师从郑钦安，深得扶阳三昧，临证善用姜桂附起沉痾大疾。卢崇汉幼承庭训，得其祖父真传，17岁即悬壶蓉城，19岁已有医名，现在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特聘的“学术传承人”。

朱法永按照同学的指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自费来到成都“卢火神扶阳中医馆”，一是求医，二是求学。回来后，他运用卢崇汉的扶阳派理论和治则方药为自己对症下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法永的母亲患有胰腺炎、糖尿病，他又遵循此法，亲自为母亲处方煎药，效果也十分理想。再后来，他又将此法应用到内外妇儿各科临床实践中，效果俱佳。

“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卢崇汉先生“一炉火”一样的医德医术令他私慕有加，扶阳派理论的独到之处及其治则方药的临床功效，使他对祖国传统医学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由此，做一名优秀的中医传承人的强烈愿望在他胸中油然而生。



学海无涯苦作舟

祖国医学宝库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和积淀，浩如烟海，灿若繁星，倘无悬梁刺股之坚忍、皓首穷经之定力，绝无穷其真谛之可能。朱法永就像一个虔诚的殉道者，为此踏上了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朝觐之路。

读书——他讲求“勤求古训，博采众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他从熟读《内经知要》《脾胃论》《汤头歌诀》《脉学》等中医入门典籍开始，夯实理论基础，进而博览历代名家名著，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在学习方法上，既注重溯本求源，取其精要，又注重变化发展，辩证继承。在学习领域上，他主张开阔视野，中西并举，兼收并蓄。朱永法热爱中医，但并不摒弃西医。他在苦读中医的同时，从未放弃对现代西医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积累和提高，尤其关注当代西医前沿理论的发展变化，广泛涉猎国内外医学界与中医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做到择善而从。他说：“往往书内知识的难解之处，却被书外知识给予点破，使之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从师——他注重海纳百川，得其要领，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他先是跟师临沂市第二批名老中医学术传承人、本院老中医周学云，进一步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根基更为扎实。2008年，他自费参加北京第二届扶阳论坛会议，开始接触扶阳理论，时隔一年又自费到成都“卢火神扶阳医馆”求学，对其理论精要、治则方药有了更加深透的理解。2010年，他参加了全省首批中医临床骨干培训学习，期间得到诸多名家点播指导，技能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12年，他成为第二届国医大师候选人、全国名老中医学术传承人、山东省名中医刘启廷老先生的入门弟子，跟师三年。在刘老的指导熏陶下，中医临床技能更加得心应手。2014年，他又拜国家药监局“龙砂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传承人、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顾植山先生为师，系统学习了龙砂医学流派五运六气理论、膏方治未病。他还自费到四川、北京、济南、潍坊、日照等地，遍访当地名医，博采众家之长。这些年，他一边跟师学习，一边认真总结不同流派和各地名医的真传要领、临床经验、治则方药，整理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跟师病案和学习心得，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

临床——他主张师古而不泥于古，不拘一方一药，因人因机，灵活化裁，忌“执一方

而御百病”，善“守一方而应万变”。比如，在中医治疗哮喘病方面，提出脾虚是哮喘发病的根本原因，血瘀是哮喘反复发作的主要病理基础，脾虚血瘀是其发病机制。在治疗上，发作期以标实为主，宜理气健脾，活血化瘀，标本兼治；缓解期以本虚为主，则益气健脾，益气健脾应贯穿哮喘防治的始终。同时，他把中医治疗呼吸科常见病的治则方药规范化、系统化，总结制定出一整套具有中医特色的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操作性强，便于推广，在临床应用中受到广泛好评。他尊崇“天人合一”的观点，把人看作一个小天地。他说：人之所以生病，外因于天，内因于人，多与气候、季节、时间、地理等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并以此为指导，在临床中注重把握整体变化，做到知常达变。

作为中华医学传承人，朱法永并非仅仅拘泥于遵循古训、墨守成规，而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勇于担当。目前，他正在致力于把中医扶阳派和龙砂医学这两大医学流派的理论精髓结合起来应用于临床实践的探索和研究，以期将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进一步弘扬广大，更好的造福于民。

一方一药总关情

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朱法永从医多年一直坚守的信念。他深知，病人是最需要关爱和体贴的群体，往往医生的一个眼神、一句问候，能给病人以莫大的鼓励和希望。因而，他始终视病人为亲人，为朋友，怀着满满的关爱与患者进行心灵沟通。他说，既然不能做一个良相治理国家，那么作为一个良医，医治的是人的身心疾苦，能够通过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拯救一个家庭来安定一个社会细胞，也算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此，朱法永钻研国医近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了准确把握各种中药材的药理药性以及处方剂量、临床效果，特别是诸如附子、半夏等毒性较大的中药，他经常亲口服用，以身试药。中药配伍禁忌“十八反、十九畏”是历代国医圣贤立下的规矩，其中虽然与实际应用有些出入，历代医家也有所论及，证明某些药物是可以合用的，但是一般说来，在临床中若无充分根据和应用经验，大都采取慎重态度，防范风险在先。目前仍属于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朱法永不顾同学同事的强烈反对，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种舍身求真、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皆源于他始终坚守的从医报国、悬壶济世的志向和信念。

市史志办党员干部到九间棚、新时代药业党性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教育。11月20日，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赴九间棚党性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九间棚党性教育基地，全体人员参观了九间棚展览馆、九间棚旧址和龙顶山天池，观看纪录片，详细了解了几十年来党支部书记刘加坤和九间棚党组织一班人带领乡亲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发展历程，感受了“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九间棚精神。在新时代药业集团赵志全同志纪念馆，通过了解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成长发展史和时代楷模赵志全的感人事迹，深刻感受到了赵志全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敬业奉献、顽强拼搏的高尚情操和艰苦创业、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拼搏精神。

市史志办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廉政教育活动。12月3日，市史志办全体在职干部职工，在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带领下，到市廉政教育馆参加了现场廉政教育活动。

大家依次参观了“琅琊清风廉韵悠悠、红色廉政薪火相传、从严治党利剑高悬、前车之鉴警钟长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五大展区，观看了《失控的“雅号”》专题警示片。大家表示，一定要加强自身廉政意识，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不断自省、自重、自警、自励，扎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市史志办到“第一书记”任职村开展结亲连心走访活动。12月3日，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带领全办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到“第一书记”任职村——费县马庄镇富民新村，开展“结亲连心”走访慰问工作，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家中。

刘志强一行先后走访村内困难群众15户，详细了解其家庭成员、收入、身体状况等情况，将结亲连心卡、年画发放到联系户手中，并叮嘱第一书记要多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走访期间还向困难群众送上了生活慰问品，价值1500余元。

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督导方志馆布展工作。12月10日，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带队，到市方志馆实地查看，督导新馆布展工作。方志馆负责人汇报了方志馆建设情况，施工方代表汇报了布展情况。刘志强主任实地查看了布展施工现场，对布展线路、板块流程、展板设计进行了仔细审核，对有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刘志强主任对方志馆布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加强沟通交流，各方密切配合，及时解决工程进展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加班加点，精雕细琢，努力打造精品，确保12月中旬完成布展任务，正式开馆。

市史志办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2月8日，市史志办组织全体在职党员，到南坊柳青街道三和园B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与三和园社区党支部对接后，双方探讨了如何结合史志部门特点，开展史志成果进社区、党建共建等工作。史志办赠送了部分史志书籍，向社区环卫工人发放了手套等劳保用品。

活动中，共发放《沂蒙史志》杂志100余册，清扫垃圾200余处，清理路面2000余平方米。

临沭县史志办到周恩来故居开展党性教育。11月2日，临沭县史志办组织部分在职党员赴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故居和周恩来纪念馆开展党性教育现场教学。

兰山区史志办开展“学楷模讲奉

献”主题党日活动。11月9日，兰山区史志办开展了“学楷模讲奉献”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就丁薛祥同志的党课报告《大力弘扬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及许步忠同志先进事迹进行学习研讨交流。

兰山区史志办组织观看《榜样3》并进行学习交流。11月13日，兰山区史志办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观看《榜样3》并进行学习交流。在观看了《榜样3》专题片后，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开展学习讨论，一致表示要向专题片中的先进典型模范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工作，为史志工作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